

芸阁与研山：嘉万时期上海顾从德家族艺术鉴藏 活动研究

孙志强

内容提要：上海顾氏家族是嘉万时期江南地区重要的鉴藏家群体，顾从德之芸阁是顾氏家族文化事业的缩影，顾从义之研山斋生活则最能体现顾氏昆仲的艺术趣味。顾氏昆仲与长洲文徵明家族保持着长期的艺术互动，在书画鉴藏、碑帖刊刻领域，顾氏昆仲与文彭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顾氏所藏书画、古籍、古玺印数量颇夥，在古籍鉴藏方面，顾氏收书多重视宋版，藏品所有权为顾氏家族成员所共有；在书画碑帖收藏方面，顾氏藏品的来源途径多样化，藏品的所有权分属顾氏昆仲之个人。顾氏书画散佚的大致时间在隆庆、万历之交，顾从德、顾从义二人与项元汴有数次交易记录，藏品多流入项氏天籁阁、王氏弁山园。顾氏所藏古玺印有一部分来源于丹阳孙氏，万历中期，顾氏所藏古玺印开始散佚，并呈现出分批次、多方向散佚的特点。顾氏家族的书画、古籍、古玺印鉴藏，以及古籍、印谱出版，为进一步塑造顾氏世家大族的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嘉万时期 上海顾氏 文化事业 书画鉴藏 古玺印

引子：“眇视者”与“大法眼”——项元汴与詹景凤对顾氏兄弟鉴藏眼光的评价

万历四年（1576）十一月，嘉兴天籁阁中迎来了一位徽州客人，此人即是途径嘉兴北上的詹景凤。在天籁阁中，藏品一向秘不示人的项元汴，在出示了王羲之《兰亭序》、索靖《出师颂》、欧阳询《梦奠帖》等名迹之后，又出示了一卷唐拓《定武兰亭》。此时，该拓片的所有权仍为上海顾从德所拥有，至于顾家之物何以在项家，从詹景凤所说“汝修上铨部，以此质项元汴家”一语可知，此拓本为顾从德至北京任中书舍人时，抵押在项家之物。^[1]杯盘狼藉之际，项元汴与詹景凤谈及当世的鉴赏家，项氏说出了一番令詹景凤瞠目之言：

项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按，指王世贞、世懋）则瞎汉，顾氏二汝（按，指顾从德、从义）则眇视者尔。唯文徵仲具双眼，则死已久。今天下谁具双眼者？”^[2]

[1]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文氏顾氏翻刻〈定武兰亭〉十四跋》，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

[2]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文氏顾氏翻刻〈定武兰亭〉十四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项元汴自信地认为“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他的此番言论大类曹孟德“煮酒论英雄”，或可以称之为项子京“赏画说具眼”。半年后的万历五年（1577）五月，詹景凤先后通过许初与文嘉收得了上海顾氏、长洲文氏两家所翻刻的《定武兰亭》拓本各一本，顾氏翻刻的底本即是抵押在项家之物，文氏翻刻的底本则是赵孟頫十三跋本，詹景凤将此二者合装为一卷。在接下来不足两年的时间里，詹景凤针对此卷连续作了十四则题跋，上述项元汴对顾从德、顾从义“眇视者”的轻视之论，即是出自詹景凤《文氏顾氏翻刻〈定武兰亭〉十四跋》中的转述。项元汴的这种自负，在一向以善鉴自负的詹景凤眼中，无疑是可笑的，所以詹景凤不仅当面回复“卿眼自佳”，而且事后对其又有“第项为人鄙吝”“骄矜”之评。作为徽州人，詹景凤素来对苏松一带鉴藏家的眼光给予严苛地批评，如他在一些题跋中，虽然一方面对文徵明的绘画表现得爱入骨髓，而另一方面又对文徵明的某些鉴定结论毫不含糊地予以否定。从交往史料的多寡来看，詹景凤与上海顾氏兄弟之间的熟悉程度恐怕超过项元汴。万历五年詹景凤与顾从德、顾从义相聚于北京，在詹景凤的《詹东图玄览编》中，仅此一年中就有多条他们三人交流书画鉴藏的记录。在这些文献记载中，既有詹景凤对顾从义误收刘松年伪作的驳斥，也有两次詹景凤向顾氏兄弟请教《定武兰亭》版本的记载。尤为重要的是，詹景凤对顾氏兄弟鉴藏水准的肯定多于否定，詹景风云：

予昔闻云间莫廷韩、顾汝和、汝修三人，赏鉴并具大法眼。^[1]

“大法眼”一词代表着鉴藏眼光的权威与鉴定的精准，顾从义就曾以“法眼”二字赞誉过文徵明。^[2]同样是评价顾氏兄弟的鉴藏眼光，詹景凤的“大法眼”与项元汴的“眇视者”，可谓截然相反，由此可见詹景凤对顾氏昆仲鉴藏水准的认可。

时间回到万历元年（1573）初秋，这年秋天的一件事，似乎能够解释为何王世贞兄弟得到项元汴“瞎汉”之讥，顾从德兄弟得到“眇视者”之评。这年王世贞“因损一岁奉（俸）”入手了顾从德旧藏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手卷。这件作品现藏故宫博物院，按照今天的研究结果来看，该作绝非柳书。（图1）但在嘉万以至崇祯时期的鉴赏家眼中，除了詹景凤对柳公权所书有所质疑外，绝大部分鉴赏家对此都无异议，如顾从德、王世贞、文嘉、莫是龙、张凤翼、张献翼、钱穀^[3]、黎民表、顾从义、许初、文彭^[4]等，他如孙鏞、董其昌、张丑等都将该作看做柳书代表。^[5]以上诸人对该作的鉴定确实失明，但不能说这批明代最具代表性的鉴藏家是“瞎汉”“眇视者”。事实上，恐怕项元汴未必真认为顾氏昆仲为“眇视者”，若真的如此，那项元汴后来一系列的行为将无法解释——天籁阁，是入藏顾氏昆仲旧藏最多的地方，如顾氏旧藏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张旭

[1]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页。

[2]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页。

[3] 以上诸人见（传）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卷后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4] 黎民表、许初、文彭、姚澹鉴赏该作之记载，见黎民表：《瑶石山人稿》卷六中载《佛日过顾汝和，观柳公权书〈兰亭褙帖〉》，同许元复、文寿承、姚元白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页。

[5] 关于《书兰亭诗并后序》在明、清两代鉴赏的讨论，可参见杜娟：《以〈书兰亭诗并后序〉为例看明清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2期，第37—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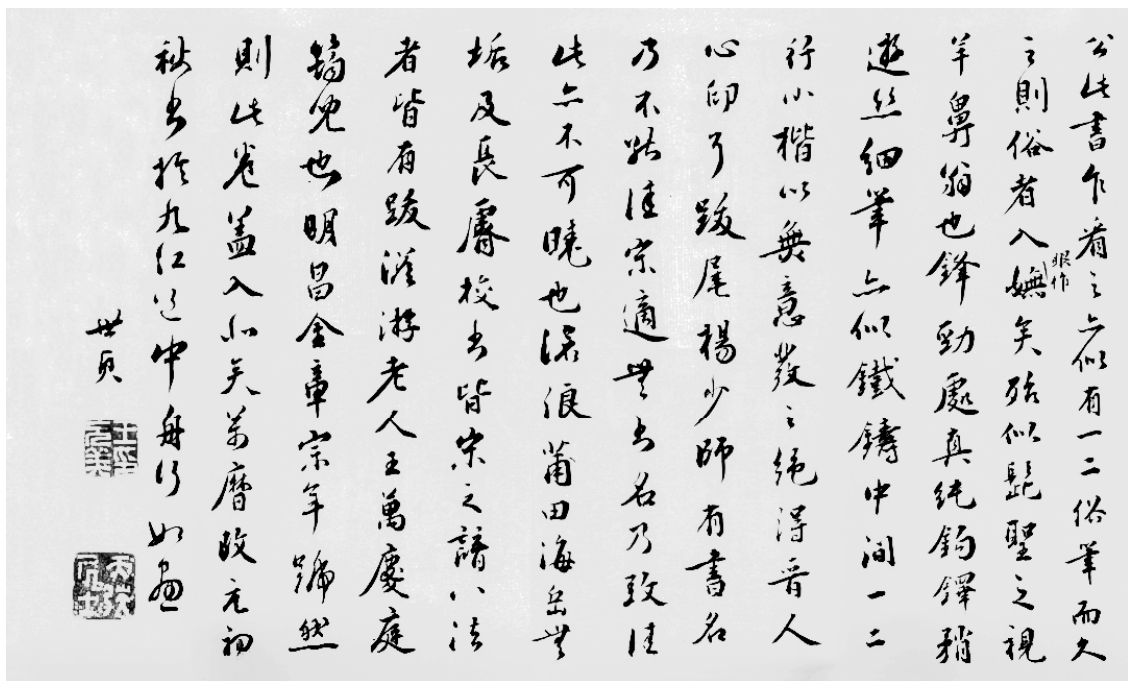


图1 (传)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顾从德旧藏，万历元年(1573)王世贞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的《兰馨帖》《春草帖》《烟条帖》，米芾《蜀素贴》，赵士雷《湘乡小景图》等，这些原属于顾氏兄弟的珍藏，均流入了项氏天籁阁中。

嘉万时期是明代书画鉴藏史上的巅峰时期，“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顾氏昆仲“并翔艺苑，义同韦氏，鉴有张华”，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鉴藏家。至少从顾氏兄弟之父御医顾定芳开始，顾氏在江南一带已享有鉴赏家的盛名。张应文《清秘藏》卷下“叙鉴赏家”中罗列了其心目中自洪武朝至嘉靖朝真正的“鉴赏家”30人，如徐有贞、李应楨、沈周、吴宽、祝允明、陆完、文氏父子、陆深、王世贞、王世懋、项元汴等，在这份名单里，顾定芳之名也赫然在列。^[1]嘉万时期上海顾氏在艺术鉴藏活动中，是否如同项元汴所说的是“眇视者”？顾氏与长洲文氏之间有怎样的艺术互动与艺术合作？顾家刻书的目的是什么？顾氏兄弟的书画、古籍藏品有哪些？其藏品来源与散佚过程有过怎样的经历？顾氏古玺印的聚散过程如何？这些问题是本文所重点关心的议题。

关于上海顾氏的研究，一直是印学界关注的重点，目前已有的研究多基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针对上海顾氏家族成员的考证，较为翔实的成果如孙向群《顾从德家族辈分行第事迹考》一文，该文解决了顾氏家族的世系、家族成员辈分问题，对理解顾氏家族的艺术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二是对顾氏《集古印谱》以及《印藪》版本的研究，如杜志强《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藪〉版本的初步考察》基本厘定了顾家印谱的版本问题；^[3]三是针对顾氏藏印的研究，新近的

[1] 张应文撰：《清秘藏·卷下·叙鉴赏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2] 孙向群：《顾从德家族辈分行第事迹考》，《印说》2007年第2期。

[3] 杜志强：《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藪〉版本的初步考察》，《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425—456页。

研究成果是古菲《万历年间的集古印谱与文人篆刻（1572—1602）》一文。^[1]此外，需要提及的是钱镜《顾从义书画鉴藏略论》一文，是较全面梳理顾从义鉴藏活动的专文。^[2]

一、芸阁与研山：上海顾氏的文化事业与艺术趣味

（一）芸阁：顾氏家族文化事业的呈现

古往今来，文人斋室之名多寄托主人之人生理想，顾氏也不例外。顾氏所使用的斋馆号众多，除了较为知名的南溪草堂、芸阁、研山斋、玉泓馆之外，尚有万玉楼^[3]、桃花馆^[4]、雪舫^[5]、芳园、续玄阁、静瓮^[6]、石鼎寮^[7]、昙花庵、露香园^[8]等。对于这些斋馆号，没必要逐一繁琐考证，我们只需通过顾从德的“芸阁”与顾从义的“研山斋”，即可了解到顾氏家族所追求的“文化事业”与“艺术趣味”。

“顾氏芸阁”四个字对于万历以降的印人而言一定不会陌生，自万历三年（1575）《印藪》行世以后，刻于《印藪》书口下部的“顾氏芸阁”（图2）四字即已为天下印人所熟知，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印藪》的利与弊，却不妨碍“芸阁”二字在万历以降印人心目中的地位。“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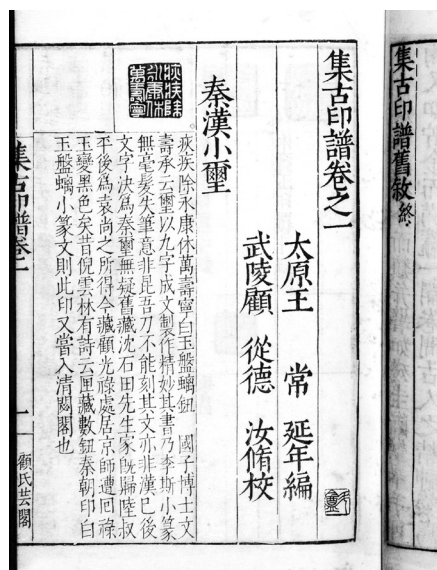


图2 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谱》（《印藪》）卷一卷端页书口处“顾氏芸阁”字样，明万历三年（1575）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

[1] 古菲：《万历年间的集古印谱与文人篆刻（1572—1602）》第二章第一节，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2] 钱镜：《顾从义书画鉴藏略论》，《收藏家》，2017年第10期，第71—78页。

[3] 顾从孝斋馆号。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孝刻本《南唐书》三十卷（索书号：善08009），是书卷一卷端页有“万玉楼”白文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所著录者亦有该印，故叶氏亦称“顾汝达万玉楼”（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18页）。又，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据北京大学藏明嘉靖间刻本解题，此本无该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王重民先生并未将“顾汝达”与顾从德兄弟联系起来，王先生据《松江府志》所载上海“顾汝经、顾汝纶兄弟”，又据此书与顾从德所校刻群书不类，而将《南唐书》之刻者“顾汝达”定为顾汝经一族，误。

[4] 顾氏斋馆，具体所属不详。文洪：《文氏五家集·卷八·博士诗集·下·人日集顾氏桃花馆，同集者黎惟敬、休承弟、顾汝和诸昆季也》，《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5页。

[5] 顾从义斋馆。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五《同袁鲁望、文寿承饮顾汝和雪舫得凉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6] 《过云楼书画记》卷五“画类五”著录了两卷文伯仁所画《文五峰芳园十五景图卷》，其中一件存文彭所题写顾氏斋馆号。顾文彬著，柳向春校点：《过云楼书画记》卷五“画类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7] 顾从义斋馆。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三《题顾汝和石鼎寮》，《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

[8] 露香园，顾从义园林，清嘉庆道光间废，道光十七年（1837）前后上海徐紫珊在其旧址建仁粟堂，并摹刻顾从义《石鼓文》端砚置之仁粟堂中，见张廷济《桂馨堂集》卷四《上海顾氏露香园旧址新建粟厂复葺园亭，次韵翁问学题顾园画册诗韵》《上海徐紫珊移海盐张文鱼重摹石鼓置新建仁粟堂，用前韵纪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377页。

阁”二字是顾氏家族追求文化事业最好的注脚，关于“芸阁”之名的由来，欧大任《芸阁记》一文论之甚详：

鸿胪顾君家故多书，不下万卷，自其先御医公之所遗，而更广购之者也。即其居之爽垞，地筑重屋度之，谓芸可辟蠹也，氏曰芸阁，属余为记……君尝括综百家，讨论六籍，搜往牒之精奥，发群藻之英华，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学已求其大者，岂但刘向通古今之籍，马融见天下之书，京房察风雨之占，裴楷晓阴阳之术而已哉？昔解牛擅于庖丁，斫轮讥于堂下，诚有味哉其言也。君所贻于子子孙孙，百世菁莪之泽，可不以说铃（笔者注：原文作“铃”，误，据文意改）、书篋为戒乎？余未睹河编，徒辑山笥，窃欲湛思大业，聊为君诵所闻。君名从德，字汝修，盖上海名族云。^[1]

从该文可知，作为建筑样式的“芸阁”，其形态为“重屋”；作为实用的“芸阁”，其功用是顾家皮藏书籍之所；尤为注重地是，作为文化象征意义上的“芸阁”更值得我们关注。“芸阁”一词中的“芸”字，乃芸草、芸香之简称，古人以芸香避蠹虫，故官方藏书之所可称为芸台，私家藏书之地多称芸窗、芸馆等。藏书与刻书是顾家最重要的文化事业，“芸阁”二字蕴含顾家对诗书世家强烈地追求心态。就藏书而言，虽无法得知顾家藏书的确切数目，但顾家一些重量级藏品在后世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最典型的例子即是顾从德所藏宋版《汉书》，这部《汉书》在明代鉴藏圈里可谓人尽皆知，^[2]它在元代的主人是赵孟頫，前有赵孟頫自绘小像，文徵明八分书题签，又有陆师道在芸阁中所书写的题跋，在进入芸阁之前，它被长洲陆完家族珍藏，顾氏之后复为王世贞用一座庄园的代价所购得，王世贞云：

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书，尤为诸本之冠……前有赵吴兴小像，当是吴兴家入吴郡陆太宰，又转入顾光禄，余失一庄而得之。^[3]

这部《汉书》在明末清初时又成为钱谦益的案头长物，后钱氏将其转售四明谢三宾，换得了绛云楼建造的费用，事后钱氏将此视为他生平中最煞风景之事。借由这部《汉书》，链接了元代赵孟頫，明代陆完、文徵明、陆师道、顾从德、王世贞，以及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等人，其间的文化象征意义又绝非一部《汉书》所能详尽。它和顾家的另一藏品——“痰疾除永康休万寿宁”秦蟠螭小玺一样，是元代后期以来江南地区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顾氏小玺的递藏经过也同样不凡——此印“旧藏沈石田家，既归陆叔平，后为袁尚之所得，今藏顾光禄处，居京师遭回禄……此印又尝

[1] 欧大任：《欧虞部集》文集卷十《芸阁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8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8页。

[2] 有关这部《汉书》的讨论，可参见范景中先生《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一文，范文中将王世贞“又转入顾光禄”一语中的顾光禄定为成化、弘治间昆山顾恂，误。见《新美术》2009年第四期，第26页。

[3] 于敏中等著：《天禄琳琅书目》卷二，《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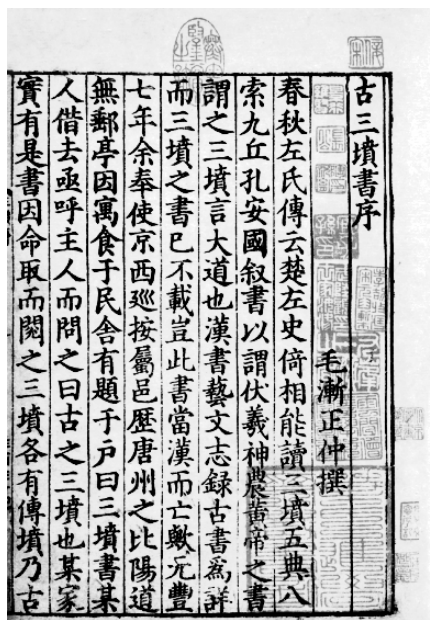


图3 顾从德旧藏宋绍兴十七年（1147）刻本《古三坟书》书影，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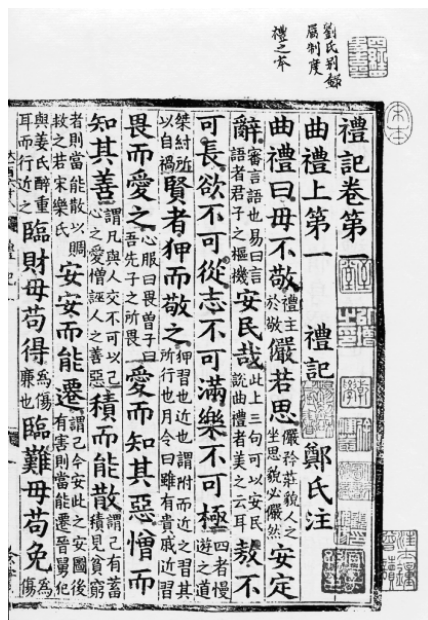


图4 顾从德旧藏宋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庠刻本《礼记》书影，国家图书馆藏

人（倪瓚）清闷阁也”。^[1]顾氏藏书重宋版，且重名家旧藏，除赵孟頫旧藏《汉书》外，仅顾从德本人所藏的宋版尚有严元照《书春秋张氏集传》、宋刻本《新唐书纠缪》、宋兴文署版《资治通鉴》、宋绍兴十七年（1147）《古三坟书》（图3）、宋淳熙四年（1177）刻本《礼记》（图4）、宋嘉定间刻本《乖崖集》等。关于顾氏古籍鉴藏的讨论，我们将放在下文展开，此处暂不枝蔓。

与藏书事业同步进行的，顾氏还有刻书之举。顾定芳所刻医学类书籍，已为研究者所熟知，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顾定芳刻本《医说》十卷^[2]；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定芳令顾从德以家藏宋本为底本重刻《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图5）^[3]。顾氏昆仲对刻书较顾定芳显得热衷得多，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顾家刻书的一个高峰时期，除《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行世外，尚有顾从敬以家藏宋本覆刻的《类编草堂诗余》四卷^[4]、顾从孝所刻《南唐书》三十卷^[5]。在木活字印刷方面，顾氏也有过尝试，以万历元年（1573）顾从德芸阁木活字印本杨循吉《松筹堂集》十二卷为代表。^[6]而最为艺苑熟知的是万历三年（1575）顾氏芸阁所刻《印藪》一谱。从隆庆六年（1572）的原钤《集古印谱》到万历三年（1575）木刻本《印藪》的转换，不应仅仅看作是顾氏兄弟为求射利所做出的权宜之举，更重要的是，应该将《印藪》的诞生看作顾家所追求的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这也即是顾从德在《刻〈集古印谱〉引》所说的：

[1] 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谱》（《印藪》）卷一，万历三年（1575）顾氏芸阁刻朱印本。

[2] 《医说》十卷目录一卷，明嘉靖二十三年上海顾定芳刻本，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R—092/m1），是书之叙录见程新著：《珍本古医籍版本叙录》，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7—599页。

[3]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九年顾定芳、顾从德重刻本。

[4] 《类编草堂诗余》，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九年顾从敬刻本（索书号：CBM2402）。

[5] 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孝刻本《南唐书》共两部，索书号分别为：善08009，另一部善04998。

[6] 沈津著：《书城挹翠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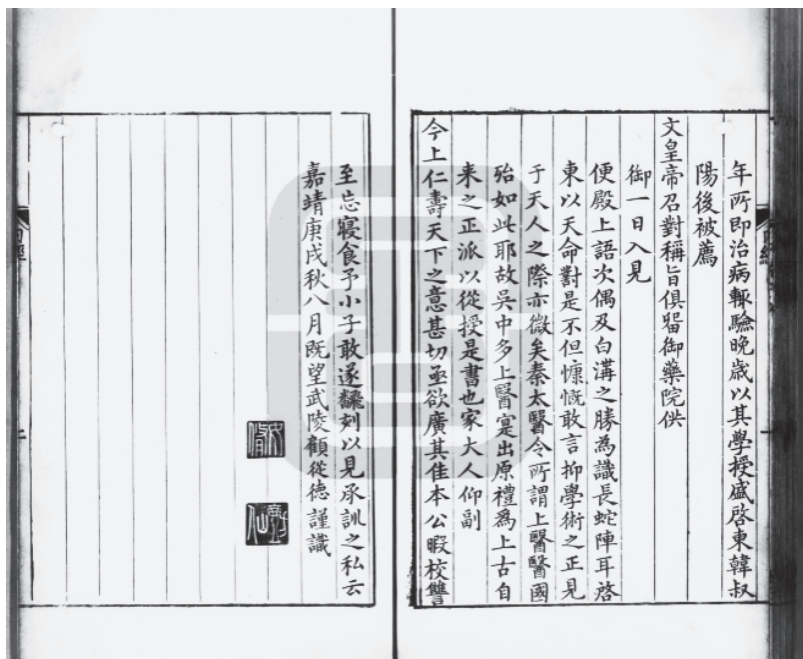


图5 顾从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跋，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德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余既集古印若干枚，用硃用墨印越楮上作谱者，凡二十册矣……恐散而弗克，常储为一家物，或久益漫灭，并失以在也，后之人抑又何以能尽睹今兹之全也。用是乃起而哀诸前人所谱，如赵子昂氏、王顺伯、杨宗道、吴孟思者，尽付梓人，庶永不至磨灭，而古人之遗意，如诸家所序论者，幸与后千载者同之。此余刻谱之意，敢僭引诸前？……万历三年人日，武陵顾从德识。^[1]（图6）

“庶永不至磨灭”与“幸与后千载者同之”正是顾氏藏印“尽付梓人”的本意，由此来看，欧大任《芸阁记》中“可不以说铃（铃）、书麓为戒乎”的劝勉砥砺之言，顾从德恐怕是深有体会。嘉靖二十九年（1550）姚昭在跋顾从孝刻本《南唐书》时，也特意指出此顾刻本的意义，即借由此书而窥视南唐之“流风余韵，千载犹存”，姚氏云：

迄今江左人文甲海内，而好市古书画，辄倾囊橐，故遐方人士游历兹土，见者目为“吴痴”，流风余韵，千载犹存。读是书者，可以想见矣。^[2]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即会发现，顾家所藏书籍绝大部分为宋版书，元代刻本偶一二见，明版仅见一部明抄孤本《诗渊》；所刻的各类书籍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底本的选取上力求以宋版入梓，并且排斥宋代以降的版本，如顾从孝重刻《南唐书》，即因“厌家藏元刻舛讹”。底本选取的

[1] 顾从德：《刻〈集古印谱〉引》，万历三年（1575）顾氏芸阁刻朱印本。

[2] 姚昭跋顾从孝刻本《南唐书》，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孝刻本（索书号：善08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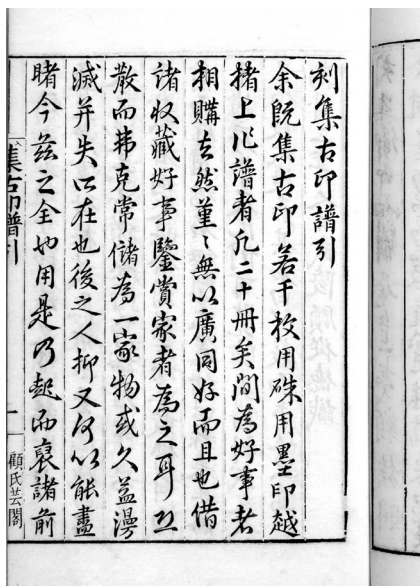


图6 顾从德《刻集古印谱引》，《集古印谱》（《印藪》），明万历三年（1575）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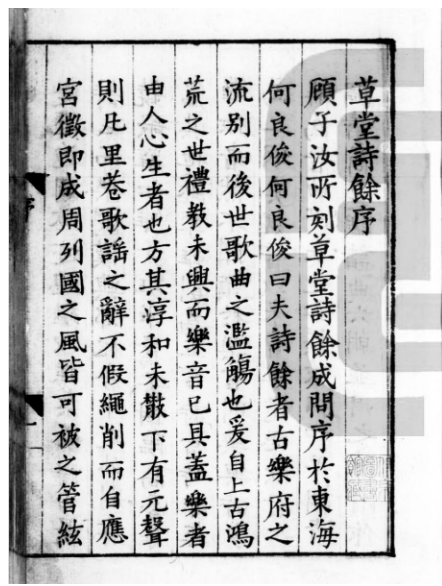


图7 何良俊《草堂诗余序》，《类编草堂诗余》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严苛、校对的精审、刊刻的细致，无不体现出顾家对于藏书、刻书事业的慎重，这与同一时期福建建阳地区所刻书籍的差异不啻天壤。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顾家所刻图书的读者绝非粗识文墨之人，而应是有较高文化水准与文化地位的文人精英。不可否认，顾氏在刻书活动中也有射利的考虑，如《印藪》前钤古玉珉，下标“每部价银一两五钱”^[1]，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印藪》的面世，完全看成是顾氏追求经济效益的产物，它和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行学之《宣和集古印史》纯粹追求利益的行为完全不同，如来氏《宣和集古印史》不仅假托掘地得桐棺，又兼翻刻顾氏之谱而妄称宋人之遗，至于其中所列印谱、印泥之价格，^[2]尤为后世所诟，清代四库馆臣即称其“尤为猥鄙”。^[3]

对于《印藪》面世的认识，应当放置在顾氏家族整体藏书、刻书的文化事业中考察，顾家通过刻书事业进一步巩固其家族文化资本，累积世家声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顾从德主持翻刻《素问》一书时，所言翻刻之目的为其“以见承训”一语也可以看出。^[4]嘉靖二十九年顾从敬以家藏宋本为基础重刻《类编草堂诗余》一书，书成，何良俊为之作序，何氏着重突出书写的也是顾氏“上海名家”“绰有门风”，何氏云：（图7）

[1] 目前所见万历三年（1575）刻本《印藪》大部分未存此价格牌记，所存者如西泠印社藏本，书影见陈振濂编著《中国印谱史图典》（上），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 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首册卷前云：“官印一套纹银一两五钱，私印二套，纹银三两。”八册卷八末：“宝印斋监制珊瑚、琥珀、珍珠硃砂印色，每两实价五钱，硃砂印色每两实价二钱。”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万历二十四年来氏宝印斋刻钤印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6439）。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79页。

[4] 顾从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跋，明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德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善08929）。

顾子上海名家，家富诗书，代传礼乐。尊公东川先生博物洽闻，著称朝列。诸子清修好学，绰有门风……^[1]

万历四十二年(1614)陈继儒以顾从敬所刻版本为底本，重新加以注释而成《类选笺释草堂诗余》四卷，钱允治为之作序，云：“先刻《草堂诗余》无如云间顾汝所家藏宋本为佳，继坊间有分类注释本，又有毗陵长湖外史续集本，咸鬻于书肆……惟注释本脱落谬误，至不可句。”^[2]钱氏作序时，已距顾从敬初刻该书过去了60余年，按照钱氏的说法，这60余年中，《类编草堂诗余》的刻本有数种行世，但钱氏仍认为“无如云间顾汝所家藏宋本为佳”，这无疑是对顾氏家族文化事业的肯定，恐怕这也是顾氏昆仲热衷刻书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概言之，“芸阁”，不仅是呈现顾氏家族文化品位的缩影，更是顾家塑造文化世家过程中的缩影。关于“芸阁”的讨论先到此为止，我们接下来再将目光转移到顾家另一个斋馆——顾从义之“研山斋”。

(二) 研山斋：顾氏家族艺术趣味的典型

“研山”是顾从德之弟顾从义的号，“研山”二字来源于米芾之研山，米家的研山在嘉靖年间成为顾氏案头之物，顾从义不仅以“研山”为号，还取“研山”二字名其室曰“研山斋”“研山山房”，以“研山”名其文集曰《研山山人诗稿》。与顾从德芸阁中的文化事业相较，顾从义似乎更以追求“艺术趣味”见长，“研山”二字的来源及其意蕴也较“芸阁”轻松活泼得多。虽然顾从义也收藏宋版书，但其鉴藏的重心却在书画碑帖上，他一生的事功见于陈所蕴所撰写的《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评事研山顾先生墓志》^[3]一文，与这篇较为郑重的墓志铭相比较，何三畏的《顾廷评研山公传》一文，则更为生动地为我们勾勒出顾从义人生的另一面：

公性好石，尝得米元章研山而宝之，遂以为号。公生而玉立岳峙，长厚谦和，读书聪颖绝伦，过目辄成诵，第不喜博士家言，喜披览秦汉书，晋魏唐诸家词赋，及古斯邈篆籀文，日据案而仿摹之，遂擅长笔札，而会父兄宦京邸，入赘为太学生。岁庚戌，肃皇帝诏选六馆士善书者，令入殿直，公奉诏应试，称上旨，御笔署名第五，拜中书舍人，直文华殿……公之归也，与伯兄光禄汝由、仲兄鸿胪汝修，家自为社，相从杖屨，饮酒赋诗。先是，海上有潘氏四老，而顾氏亦有三老云。公建玉泓馆，结昙花庵，筑舒啸台，夷犹其间，虽风雨寒暑不辍，所蓄鼎、彝、尊、罍、甗、甌、甗、壁、刀、剑、盘、匱，皆三代以上物，帖皆善本，画皆名家大家。盖公既好古，而又精于赏鉴故也。性复巧慧，用小石斛艺怪松，古梅、琼花、奇树种种列庭户前，而自得米家研山后，又构梧台、泗滨诸怪石列盆中为小山，山隙树花木点缀其间，高不盈尺，而偃仰扶疏，居然有干霄薄云气。其自制箨冠、匏笠、芝杖、竹环，室中无不毕具，

[1] 何良俊：《草堂诗余序》，见《类编草堂诗余》，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九年顾从敬刻本（索书号：CBM2402）。

[2] 钱允治：《合刻类选笺释草堂诗余序》，见《类选笺释草堂诗余》，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善16925）

[3] 陈所蕴：《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评事研山顾先生墓志》，见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六墓文三十七，清涵芬楼钞本。

见者如入五都市而游一洞天矣。公好客，客日益进，门外之车辙恒满，坐上之尊罍不空，而租入之余弗给，则质琴书与裘带，贷子母钱以供之不少倦。至于楷书逼钟尚书，行草宗右军、大令父子，径尺大字则仿颜常山、赵承旨，而诗则法陶、韦，所著有《荆溪唱和》《重游荆溪稿》《使滇南集》，可诵也。我友陈子有太常公所蕴志公之墓，称公博物似张茂先，陆沉类东方曼倩，淳谨孝友不减万石君、郑义门，嗜癖好奇不下稽叔夜、阮遥集，而谓当于古人中求之，语不虚耳。^[1]

何三畏以上大段文字所描述的顾从义之形象，可以以“好古”与“精鉴赏”二词来概括，至于顾从义因“巧慧”而制作的种种“玩物”，最终的落脚点仍不出“好古”与“精鉴赏”二词。顾从义曾以宋拓《石鼓文》摹刻于端砚之上，这方端砚后世流传有序，也屡见之于著录文献，如翁方纲即对此砚多次评价，称此砚“一片衡峰圆石样，天然东海古鼉皮”。^[2]张廷济在其《桂馨堂集》中更是一题再题，赞其“蝇书细篆穷精奇”。^[3]这方令清代人倾慕不已的端砚，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中，使我们仍能一睹顾从义不凡的艺术品位与高超的书写技艺。^[4]另外一个例子，对我们理解顾从义的研山生活或许更有所助益。天启元年（1621）汪珂玉收得顾从义旧藏钱穀《樊川诗意图》，特意记载了汪氏家中的另一件藏品，即顾从义手制玉镶椰盂：

天启辛酉（1621）春，汤玉林共文氏《万壑松风》持来，俱有顾砚山印记。余家玉镶椰盂亦镌“砚山山房”，愚父子遂得二画与盂供一室，恍身在顾氏玉泓馆，不独樊川诗意也。^[5]

从汪珂玉的描述来看，他并没有单纯地将这件“玉镶椰盂”看作一件玩好之物，而是将其视作可以与绘画相较的长物，借此可以“恍身在顾氏玉泓馆”。顾从义的“好古”与“精鉴赏”还可以从文彭的笔下窥见一斑，嘉靖四十一年（1562），文彭丁忧毕，至北京补授顺天府学训导，在北京，文彭曾至研山斋访顾从义，并写下了一首诗题冗长的诗作《连日奔走尘冗，怀抱欠佳，偶过顾舍人汝由研山斋，见其窗明几净，折松枝梅花作供，凿玉河冰烹茗啜之，又新得鳧鼎奇古，目所未见，灸内府龙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复知有京华尘土，赋此纪兴》^[6]，诗题中，顾从义闲适的生活令文彭艳羨不已。

总体而言，顾氏昆仲的艺术趣味并没有因为其医学世家受到限制。如果说，顾从德是顾家经营文化事业的代表，那么顾从义可以视作顾家追求艺术趣味的典型。我们还要指出，顾氏昆仲之间在

[1] 何三畏撰：《云间志略·卷十五·顾廷评研山公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0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463页。

[2]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二十四“枝轩集”《题顾汝和摹石鼓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页。

[3] 张廷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卷四《上海徐紫珊移海盐张文鱼重摹石鼓置新建仁粟堂，用前韵纪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77页。

[4] 该砚及其拓片见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砚》，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3页。

[5] 汪珂玉：《珊瑚网》卷四十二名画题跋十八，《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8册，第445页。

[6] 文洪：《文氏五家集》卷八博士诗集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0页。

文化事业与艺术追求上并非形同泾渭，而是兄弟之间通力合作，除了在古籍、古玺印收藏上并力协作之外，在碑帖刊刻上也能见到顾氏兄弟之间的合作，我们仅举一例即可。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八中著录了一件顾从义旧藏的吕洞宾《赠沈东老绝句》草书作品，这则史料向未为研究者留意，据李日华记载，顾从义曾将该作摹勒入石，该作后有顾从义题跋，云：

今万历己卯（1579），余奉使滇南还京，偶获此墨迹……太原王寿之为余摹，仲兄汝修出古石，金闾施复春刻瓮于玉泓馆之松院。武陵顾从义敬识。（按：原文“从”字误作“悦”）^[1]

顾从义在摹刻该作时，“仲兄汝修出古石”即表明顾氏兄弟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此外摹勒者“太原王寿之”则极有可能是徽州罗王常。^[2]

二、上海顾氏与长洲文氏的艺术互动

顾氏昆仲与长洲文氏的交往，最早可以推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当然这仅是现存史料中所反映出的历史片段，顾、文二家的交往应当比该时间要早得多。是年夏日，顾氏昆仲中的长兄顾从礼前往北京，道经吴门时，持马和之《小雅南有嘉鱼篇图》拜谒文徵明，文徵明为之鉴定，并作跋云（图8）：

余平生所阅马和之画经，无下数十卷，若作家、士气兼备，此六幅矣。嘉靖丁未九月六日，汝由奉使北还，道出吴门，持此相识，漫为鉴定，徵明。

此时的文徵明已78岁高龄，作为江南艺苑执牛耳者之身份无可撼动，对顾氏兄昆仲，文徵明多以前辈身份指导他们的书画鉴藏。尤其是对顾从义，文徵明有过多指，（康熙）《松江府志》卷三十四顾从义传记中称其“尤为文徵明、王世贞父子所重”。嘉靖三十一年（1552）顾从义以善书选授中书舍人至北京，文徵明有《寄顾汝和》一诗相寄，中有“冀北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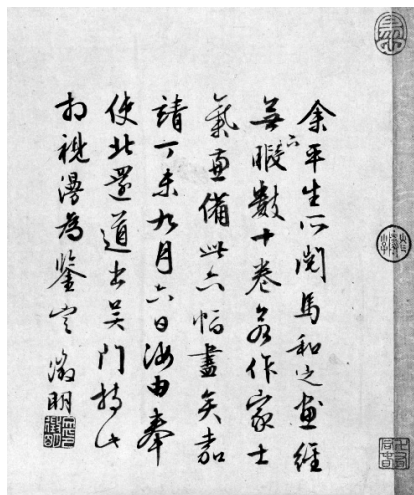


图8 文徵明跋顾从礼藏马和之《小雅南有嘉鱼篇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1] 李日华著，屠友祥注：《味水轩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卷八，第534页。

[2] 笔者推测，此处之“太原王寿之”极有可能是罗王常，罗王常避家难藏身于顾家，易姓为王，假托王氏郡望太原，又屡变姓名，至晚年方复姓为罗，学术界通过潘之恒《巨史抄》等文献已经梳理清晰。在顾家，罗王常之名为王常，字延年，“延年”与“寿之”可互通，不排除罗王常此时又字“寿之”的可能。罗王常与顾氏之间的合作也较多，除较为人所熟知的参与《印菴》之刊印外，罗王常还参与了顾从义《历代帝王法帖释文》一书的校订工作，是书卷端页署“太原王常校”，又，是书前王穉登《法帖释文考异序》之手书者亦为王常。顾从义《历代帝王法帖释文》，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索书号：善17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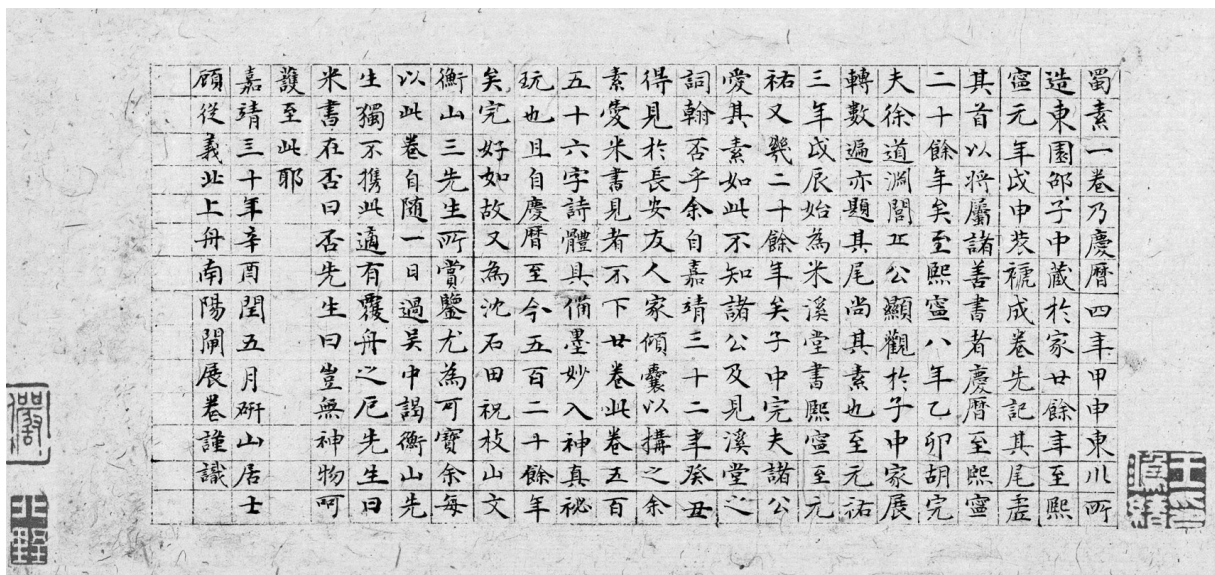


图9 嘉靖四十年（1561）顾从义跋米芾《蜀素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劳梦想，月明千里共依依”之句，^[1]如果历史可以倒流，我们肯定能见到顾从义收到该诗时的喜悦之色。^[2]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文徵明跋顾从义所藏《兰馨帖》，并定为张旭之作。嘉靖三十二年（1553），顾从义购得米芾《蜀素帖》，屡次携至吴门，四年后（1557）的十月三日，文徵明在此卷后作观跋。吴门艺坛前辈的题跋对于顾从义而言，必定能为其藏品增色不少，嘉靖四十年（1561）顾从义北上途中的跋文便是记载了这一段经历：（图9）

余自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得见于长安友人家，倾囊以购之。余素爱米书，见者不下廿卷，此卷五百六十字，诗体具备，墨妙入神，真秘玩也。且自庆历至今五百二十余年矣，完好如故，又为沈石田、祝枝山、文衡山三先生所赏鉴，尤为可宝。余每以此卷自随，一日过吴中谒衡山先生，独不携此，适有覆舟之厄，先生曰：“米书在否？”曰：“否。”先生曰：“岂无神物呵护至此耶？”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闰五月，研山居士顾从义北上，舟南阳间，展卷谨识。^[3]

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转述了顾从义的一段话，亦颇能看出顾从义与文徵明之间的关系：

松雪绢画小山水一卷，浅绛，虽林木茂而点染莹洁，笔法精雅秀润，惟林内一小童骑牛，

[1] 文徵明：《寄顾汝和》（《文嘉抄本》卷十四），转引自周道振、张月尊著：《文徵明年谱》，中华书局2020年版，卷七，第739页。

[2] 周道振、张月尊著：《文徵明年谱》，中华书局2020年版，卷八，第800页。

[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蜀素贴》。

盖法董源。汝和云：“文徵仲时时借观，至数十番不厌。”^[1]

对顾氏昆仲与文徵明之间的交往梳理暂且告一段落，让我们再来看看顾氏昆仲与文氏兄弟之间的艺术互动。顾氏昆仲与文彭、文嘉之间的互动较文徵明更为频繁，或许这批文徵明的后辈们作为艺坛同代人的缘故，他们之间的互动已经不再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文彭时代的顾、文两家之交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合作状态，典型的例子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顾从义借潘氏所藏宋拓《淳化阁帖》摹勒上石，历时四年方毕其事，世称“玉泓馆本”。文彭曾言其“亦尝效劳其中”，并在卷后作长跋，云：

《淳化阁帖》，其详备载《南村辍耕录》，在当时已难得，况今日乎！余白首止见两本，其一在荡口华氏，而阙第十卷，其一即此本也……吾友孙志周备加考索，作《释文考异》，其间点画结构稍有讹处，必为之注释。然亦未得见此本，据其驳证，则此本盖无恨矣。汝和久有此志，一旦从潘氏借摹，凡阅四年，始克成帙，亦可以为难矣。然使《淳化》祖刻复流人间，不亦快哉！有志书学者，得此则它帖可以尽废矣。余亦尝效劳其中，因书卷末以识，而刻之者，则吴人吴鼐也。隆庆元年（1567）四月朔，长洲文彭书。

文彭跋文中历数顾从义摹刻《阁帖》之经过，还提及友人“孙志周”，该人即丹阳孙楨，关于他的藏印与顾氏藏印之间的关系，我们后文还要浓墨展开。摹刻这部《阁帖》的刻工“吴人吴鼐”也值得我们留意，文彭之所以将他特意记载在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非文彭的一时兴起。吴鼐与文彭家族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薛龙春曾言简意赅地谈到“他是章简甫以外，苏州当时最有名的刻工……也是文氏家族撰书墓志铭使用最多的刻工之一”。^[2]嘉靖四年（1525）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吴鼐所刊刻的文徵明书写的各类碑铭达十余方之多，^[3]这还不包括吴鼐承担的文彭、文嘉所书碑铭的刊刻，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吴鼐就刊刻过文彭所书《王恭人墓志铭》^[4]。基于吴鼐与文徵明家族的关系，我们有理由推测，经由文彭介绍，吴鼐成为玉泓馆本《阁帖》的刻工。当然，文彭在玉泓馆本《阁帖》的刊刻过程中，绝不仅仅是介绍吴鼐给顾从义而已，从其“效劳其中”一语可知，他极有可能亲自参与了摹写工作。早在四年之前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顾从义将文徵明曾经鉴定过的家藏张旭《兰馨帖》摹勒入石，文彭就明确说道“汝和将以入石，命摹一过。老眼眇昏，殊不能得其仿佛，若风神庶几不至悬绝耳。壬戌正月廿六日，文彭记”的话。^[5]清代永理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十分重要的史料，可以印证我们的推测，他曾见一册顾从义玉泓馆本《阁帖》，称其为文彭、文嘉双钩入石，且双钩之油纸尚存于册后，可证文彭自言

[1]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

[2] 薛龙春主编：《三吴墨妙：近墨堂藏明代江南书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

[3] 程章灿著：《石刻刻工研究·下编·〈石刻考工录〉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3页。

[4] 文彭书，吴鼐刻：《王孺人墓志铭》，私人藏，见薛龙春主编：《三吴墨妙：近墨堂藏明代江南书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

[5] 文彭跋：《兰馨帖》，周道振、张月尊著：《文徵明年谱》，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801页。



图10 顾从义旧藏文伯仁嘉靖三十年（1551）画《四万山水图》之《万壑松风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1 顾从德旧藏文伯仁嘉靖四十二年（1563）画《方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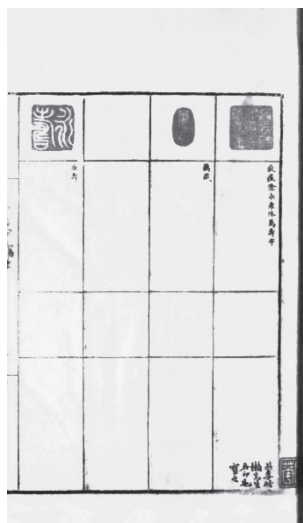


图12 文彭旧藏隆庆六年（1572）顾从德辑《集古印谱》钤印本书影，浙江图书馆藏，摘自浙江图书馆编《浙江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题跋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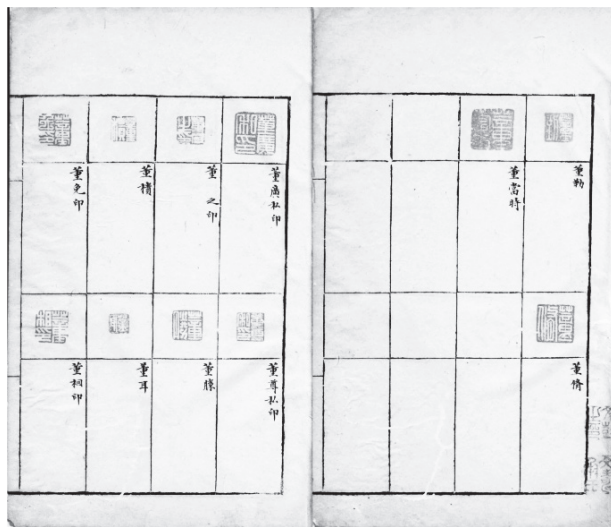


图13 文彭旧藏隆庆六年（1572）顾从德辑《集古印谱》钤印本，香港松荫轩藏

“效劳其中”一语不虚。^[1]

顾氏昆仲与文彭交往最集中的一段时间，是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开始的。这年文彭丁忧结束补授顺天府学训导，该年十二月二日，甫至北京的文彭即在灯下为顾从义所藏《兰馨帖》题写了一段题跋，连同前一年正月、本年正月的两段题跋，这是文彭在这件藏品上所题写的第三段题跋。文彭居京期间多次过访顾氏昆仲，是年除夕之夜，文彭另有诗寄顾从敬，^[2]次年（1563）人日，文彭又约同顾从敬在北京南郊踏雪闲步^[3]，前揭文彭那首诗题冗长的诗作大致作于此年年末。^[4]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一整年，文彭与顾氏昆仲之间的交往依然相当频繁，如该年四月七日，顾从义四十生辰，文彭有诗相赠，中有句云“玉殿裁书竣，金銮捧诏回。年光容易过，羨尔接三台”，^[5]多少可以看出此时文彭身居闲职之苦闷。这段时间，不仅文彭本人，其弟文嘉也在北京，文氏兄弟与顾氏昆仲之间的酬唱宴饮，未曾间断。^[6]此外，黎民表《瑶石山人稿》卷六中载《佛日过顾汝和，观柳公权书〈兰亭禊帖〉，同许元复、文寿承、姚元白集》一诗亦可以看出文、顾两家子弟之间的艺事交往。有关这一时期，文、顾之交的记载，尚有欧大任集中诗作多首：《伏日同文寿承、徐子与、顾汝和饮袁鲁望斋中，听讴者杨清歌，时子与已补长芦矣，因题此句》^[7]《伏日同徐子与顾汝和、袁鲁望、沈道楨、顾汝所集文寿承斋中，得家字》^[8]《立秋日同文寿承、徐子与顾汝和、沈道楨、顾汝所、朱子愚饮袁鲁望宅得凉字》等诗。^[9]

除文徵明、文彭、文嘉之外，顾氏昆仲与文徵明之侄文伯仁也交往密切，文伯仁曾为顾家兄弟子侄作画多幅。如，嘉靖二十八年（1548）为顾从义画《园林十五景》（又称《芳园十五景》，现藏香港艺术馆虚白斋）、嘉靖三十年（1551）画《四万山水图》（四幅，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图10）、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顾从德画《方壶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1），又为顾氏兄弟的子侄辈顾九锡画《南溪草堂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尤其是文伯仁所画《园林十五景》，此作每页后有文彭所书七言绝句各两首，由此亦可见顾、文二家交往之密切。

结合文氏父子两代与顾氏昆仲之间的交往来看，文彭与顾从义、顾从德之间应极为熟稔，他

[1] 永理：《诒晋斋集》卷八《贾本阁帖跋》：“贾似道以《阁帖》既毁，乃模其家藏本勒石，世所称贾本也是也。此册乃原拓，顾从义所收，从义属文寿承兄弟双钩复刻之，而装双钩油纸于此册之背，董文敏跋，暮年真笔也。”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2] 文洪：《文氏五家集》卷八博士诗集下《除夕答顾汝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6页。

[3] 文洪：《文氏五家集》卷八博士诗集下《雪晴同吕舍人、顾汝所南郊闲步》，该诗前一首为《人日雪晴答徐相公》，知二诗同时所作，《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第516页。

[4] 文洪：《文氏五家集》卷八博士诗集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第520页。

[5] 文洪：《文氏五家集》卷八博士诗集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第521页。

[6] 文洪：《文氏五家集》卷八博士诗集下《人日集顾氏桃花馆，同集者黎惟敬、休承弟、顾汝和诸昆季也》《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第525页。

[7] 欧大任：《欧虞部集》旅燕集卷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8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58页。

[8] 欧大任：《欧虞部集》旅燕集卷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8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9] 欧大任：《欧虞部集》旅燕集卷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8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对于顾氏三世五君的藏印也应当不陌生，甚至连顾氏所购得的孙楨旧藏印章，文彭恐怕也十分熟悉——孙楨为文徵明晚年玉磬山房中的常客，文彭与孙楨亦为至交。隆庆六年（1572）顾氏《集古印谱》行世，一年后文彭下世，虽未见文彭参与这本印谱的编纂，但文彭肯定知晓此事，并且在文彭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曾收藏了一部顾氏《集古印谱》。这部经由文彭鉴藏的印谱，现在尚能见到残本，官印一册今藏浙江图书馆（图12）。是谱黄姬水序言首页钤“文彭之印”“文氏寿承”朱文印两方，后为味水轩主人李日华所得；^[1]香港松荫轩则藏有私印一册，钤印页首页右下亦钤文氏此二印（图13）。

嘉靖时期，文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其印学趣味影响颇深，与文氏父子交往密切的顾氏兄弟很难说没有受到其影响。目前，能够见到的顾氏自用印多方，就印章风格来看，朱文印去文氏父子所用印之风格不远，如所见顾从德两方“顾氏芸阁珍藏”朱文印（图14A、B），在文徵明、文彭的用印中都能找到风格类似的印迹。但是，顾氏兄弟所用白文印却与文氏父子所用印章风格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顾氏所用大部分的白文印章在字法处理上，较文氏父子更为方正，用刀也更具爽利之感，在表现汉印气息这一点上，较文氏用印更胜一筹，这可能与顾氏昆仲长期浸淫秦汉印章，对汉印的理解较文氏深刻有关，如文伯仁《方壶图》左下顾从德所钤两方名印（图15A、B）、传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中顾从义所钤名印（图16）即是典型代表，其刀法的自觉性可见一斑。虽未见顾氏昆仲刻印之文献记载，但其对秦汉印精髓必有深刻之理解又无需置疑。其他顾氏自用印见下表，不赘述（另有多方，因特殊原因暂时无法列入下表，以俟来日）。



图14A 顾从德“顾氏芸阁珍藏”，钤于马麟《层叠冰绡图》，故宫博物院藏



图14B 顾从德“顾氏芸阁珍藏”，钤于文伯仁《方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5A 顾从德“顾从德”，钤于文伯仁《方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5B 顾从德“顾从德印”，钤于文伯仁《方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6 顾从义旧藏，李公麟《潇湘卧游图》“顾从义印”鉴藏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 浙江图书馆编：《浙江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题跋图录》著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又杜志强：《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菴〉版本的初步考察》，《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425—456页。

顾氏家族自用印印迹举隅

序号	印文	释文	所属者	出处	备注
1		顾氏芸阁 珍藏	顾从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伯仁《方壶图》	
2		顾氏芸阁 珍藏	顾从德	故宫博物院藏马麟《层叠冰绡图》、赵孟頫《水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王维《江干雪意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金代李山《风雪松杉图》等	
3		汝修	顾从德	故宫博物院藏马麟《层叠冰绡图》、赵孟頫《水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王维《江干雪意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金代李山《风雪松杉图》	此印与上一印为顾从德常用印，且二者同时钤盖，未见单独钤盖者
4		顾、从德	顾从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王维《江干雪意图》前隔水下部	
5		顾、从德	顾从德	故宫博物院藏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该印与上一印应非同一印，该印“从”字弯曲，上一印较直
6		顾汝修印	顾从德	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	
7		宜子孙印	顾从德	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	该印与上印(顾汝修印)在顾氏旧藏《礼记》中多次一并出现，且二印上下并列，应为顾氏用印，这一点另有专文，暂不枝蔓。
8		顾氏汝修	顾从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伯仁《方壶图》	

(续表)

序号	印文	释文	所属者	出处	备注
9		顾从德印	顾从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伯仁《方壶图》	
10		武陵世家	顾氏	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十七年(1147)刻本《古三坟书》	
11		顾汝修印	顾从德	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十七年(1147)刻本《古三坟书》	
12		汝修 (木刻)	顾从德	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德重刻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13		方壶山人 (木刻)	顾从德	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德重刻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方壶山人”为顾从德号
14		方壶山人	顾从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伯仁《方壶图》	
15		万玉楼 (木刻)	顾从孝	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本顾从孝刻《南唐书》卷一卷端	
16		顾从义印	顾从义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李公麟《潇湘卧游图》	
17		文华内史顾 从义印	顾从义	上海博物馆藏杜琼《南村别墅图》	
18		顾九锡印	顾九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蜀素贴》	按，故宫博物院藏文伯仁《南溪草堂图》画心右下钤“顾九锡印”(朱文)，与此印非一印，因所见图片图版不清，暂不摘录

三、顾氏书画、古籍鉴藏活动中的相关问题考论

(一) 顾氏藏品来源考察与藏品钩沉

顾氏之藏品在数量虽远不及项氏之天籁阁，但在质量上有些藏品足以与之抗衡，并且多件顾氏旧藏后来直接流入天籁阁中。顾氏藏品中有几件是重量级的，如顾从义所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本），李公麟《潇湘卧游图》《蜀川图》《九歌图》，^[1]米芾《蜀素帖》，他如巨然、吴道子等人作品，唐拓《定武兰亭》、宋拓《十七帖》（上野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翁方纲旧藏大兴成氏本）等无不在艺术史上令人垂涎，此外，赵孟頫旧藏宋版《汉书》也曾在顾家逗留。（顾氏藏品总目见“顾氏家族藏品钩沉表”）

顾定芳时期，尚没有太多史料表明他的收藏体量如何，前文已谈及，出于职业的关系，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地在于医学类古籍的收藏与刊刻。但到顾定芳的子辈，即顾氏昆仲时期，顾氏的收藏开始变得引人注目，尤其是从礼、从德、从义三人皆以富收藏见称于时。目前很难追溯顾氏每一件藏品的来源，以下以顾从德、顾从义二人为视角，梳理顾氏藏品来源的大致途径。

顾从德藏品来源的渠道较广，既有收自江南大族者，如唐拓米芾、赵孟頫题跋本《定武兰亭》，收自毗陵华氏；^[2]又有直接来自古董商者，如其所藏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即在嘉靖二十年（1541）从苏州古董商人黄茂夫处以五十金所得。^[3]同时，他也有一些书画藏品购自市肆之中，如传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手卷，据莫是龙所记，该作为顾从德得自市肆之中，并且价格相当低廉，莫是龙云：

（柳《序》）初归吾郡顾汝修家，以得诸市盲儿，钱不满百，元美先生竟以十万钱购去，其真赏好事如此。始拂拭武陵之手，继长价琅邪之门，会其时哉，可存一慨。^[4]

除了这些相对零散的购买记载外，顾从德藏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即直接来自长洲陆完家族。

[1] 顾氏所藏以上四幅画作，及至乾隆朝并归内府，《石渠宝笈初编》曾著录。《潇湘卧游图》前隔水有董其昌题跋：“海上顾中舍所藏名画有四，谓顾恺之《女史箴》，李伯时《蜀江图》《九歌图》，及此《潇湘图》耳……皆奇踪也。”关于这四幅作品是否为顾氏旧藏，有的学者提出异议，如姜鹏《顾从义四名卷说质疑》一文认为，此四幅作品中仅《潇湘卧游图》中钤有顾从义之印鉴，所以目前针对其他三幅作品的真伪，及其是否经由顾氏收藏值得怀疑。姜文载李安源主编《与造物游：晚明艺术史研究》（壹），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79—91页。姜文论述翔实，但一些重要观点笔者并不认同，将另有专文讨论，此处暂不枝蔓。

[2]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文氏顾氏翻刻〈定武兰亭〉十四跋》：“项氏本得之云间顾氏，顾氏得之毗陵华氏，华氏得之云间何元朗。”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3] 黄茂夫即苏州黄櫨，其人业古董为生。丰坊：《南禺书画目》：“苏州黄櫨字茂甫，号西池，住福济观西首，门前药铺，习贩古董。”白谦慎、陈斐蓉整理《南禺书画目》，载《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又，文彭在黄櫨处曾以十六两白银得古画一幅，转让与项元汴，见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四书二十四，《中国书画全书》第9册，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4] 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五历代名人书跋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2页。

陆完（1458—1526），字全卿，号水村，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正德朝官至兵部尚书，后以通朱宸濠谋反被执，籍没家产。陆完是明代中期重要的收藏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怀素《自叙帖》、周文矩《文会图》等都曾经陆氏珍藏。陆完为顾从德妻子之祖父，正德十五年（1620）陆完被籍没家产时，部分藏品仍得以留存陆家，并未完全散尽。由于陆、顾二家的姻亲关系，顾从德从陆家收得书画多件，如传王维《江干雪意图》即来自陆氏，这幅作品在明代被认为王维真迹，曾经吴门前辈沈周收藏，其影响可想而知。今《江干雪意图》前隔水下钤“长洲陆完”白文印，陆氏印下钤“顾”“从德”连珠印（图17）；卷末王鏊跋后又有顾从德“汝修”“顾氏芸阁珍藏”印章各一方，卷末另有嘉靖四十五年（1566）顾从德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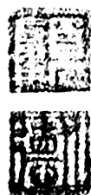


图17 顾从德旧藏（传）王维《江干雪意图》卷前隔水陆完“长洲陆完”，顾从德“顾”“从德”鉴藏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王右丞《江干雪意卷》乃妻大父陆太宰水村公家物也，向与怀素《自叙帖》、周文矩《文会图》、刘松年四画同宝藏，曾经裱工目，皆言于有力者夺取。惟此卷与张长史《濯烟帖》未经重裱，人未获睹，故尚存，从德以四十锭得之。嘉靖丙寅秋（1566），武陵顾仲子记。（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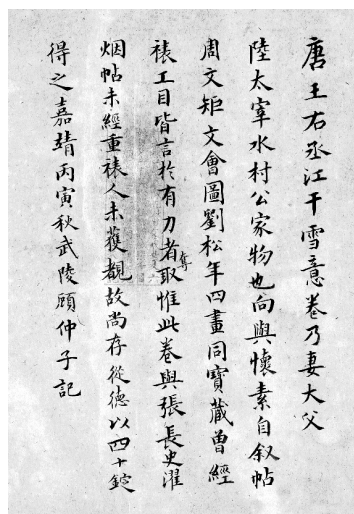


图18 顾从德旧藏（传）王维《江干雪意图》卷末嘉靖四十五年（1566）顾从德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江干雪意图》外，流入顾从德手中的陆氏藏品尚有马麟《层叠冰绡图》（故宫博物院藏），该画地轴裱有顾从德题跋：

嘉靖丙寅（1566）秋，用四十五金得于妻弟陆氏，共两幅，共值白金。顾从德记。

根据顾从德在两画题跋所记时间来看，《江干雪意图》与《层叠冰绡图》极有可能是同时购藏的。此外，前揭顾家所藏赵孟頫旧藏宋版《汉书》亦得自陆氏。

顾从义的藏品大多为其在北京任中书舍人期间所得，其来源大致有二。一是直接购买自市肆，如其所藏巨然《小景山水卷》即购于北京内市。市肆中所购书画之真伪难以得到保证，除巨然《小景山水卷》被詹景凤称之为“亦奇物也”之外，^[1]他在市肆中所购书画中也不乏赝品。万历五年（1577）顾从义在北京灯市中购得刘松年巨幅绘画两张，“大喜，夸示友人，以为奇货”，但经过詹景凤鉴

[1]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定,实为贗品,顾从义遂以文徵明亦以“法眼者”尚且买到假画自慰。^[1]顾从义藏品的另一个来源,即购自熟人处,这部分藏品在质量上明显要比购买自市肆者可靠得多,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从北京友人家倾囊以购的《蜀素帖》,还有吴道子《观音七十二化身卷》,“原为陆文裕公家物,严氏当国时归严氏;严氏败,入成国公朱建庵;朱死,家奴窃出,售顾汝和,九十金”。^[2]

通过以上梳理,大致也能看出顾从德、顾从义书画收藏之来源,与项元汴等鉴藏家的收藏渠道并无二致,仅是由于顾家与其他家族的姻亲关系,如陆完家族,而得以更便捷地入藏某些书画。至于嘉万时期,到底有多少书画、碑帖、古籍在顾氏芸阁、研山斋里停留过,或许永远也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以下仅就文献记载,以及存世书画、古籍等之上所钤顾氏印章,将顾氏旧藏列于下。^[3]

藏品类别	藏品名称	所有者	顾氏题跋	顾氏钤印	现藏地(著录)	备注
法书 (含碑帖)	(传)唐柳公权《兰亭诗并后序》	顾从德		前隔水右下钤“顾”(白文)、“从德”(朱文)连珠印;后隔水钤“汝修”(白文)、“顾氏芸阁珍藏”(朱文)	故宫博物院	
	唐拓《定武兰亭》(米芾题,赵孟頫跋本) ^[4]	顾从德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	
	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顾从德		前隔水钤“顾”(白文)、“从德”(朱文)连珠印	故宫博物院	
	南唐《澄心堂帖》 ^[5]	顾从德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八十九	

[1]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页。

[2]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3] 是表仅统计顾从礼、顾从德、顾从义,以及顾从礼子顾九锡,亦即所谓顾氏“三世五君”中人之藏品;又因未见顾定芳所藏书画的记载,故而顾定芳不计入;顾家所藏古籍部分可能为顾定芳所收(如仅钤有“武陵”连珠印的宋版《资治通鉴》等),这部分古籍后期分藏于顾从德兄弟之间,故而亦不算作顾定芳所藏。顾氏兄弟中之从仁、从孝、从敬三人基本未见书画收藏之记载,故从略。

[4] 詹景凤云:“十三跋本与项氏所藏米元章题字本皆唐拓……项氏本得之云间顾氏,顾氏得之毗陵华氏,华氏得之云间何元朗。”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文氏顾氏翻刻〈定武兰亭〉十四跋》,《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5]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八十九《答王明府方伯》:“辱示论《澄心堂墨帖》,以仆所辑《古今法书苑》遍考之,不著。唯遇顾汝修秘书云,曾藏之三载,是真南唐拓也,纸墨不在《淳化》《大观》下,想当然耳。”此处之“想当然耳”可有两种解释,一是顾从德想当然认为此帖为南唐物,如此则王世贞对此抱有否定态度;二是王世贞本人为“想当然”的主语,即王氏亦认同顾从德之判断。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看法,即王世贞否定此帖为真,这从王世贞遍考其《古今法书苑》不得这一举动即可得知。《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98页。

(续表)

藏品类别	藏品名称	所有者	顾氏题跋	顾氏钤印	现藏地(著录)	备注
法书 (含碑帖)	唐张旭《兰馨帖》	顾从义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八	
	唐张旭《春草帖》	顾从义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	
	唐张旭《烟条帖》	顾从义 (或顾从德)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	
	唐吕洞宾《赠沈东老绝句》	顾从义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八	
	宋米芾《蜀素帖》	顾从义	有顾从义跋	钤“顾九锡印”(朱文)	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黄庭坚《头陀赞》	顾从义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一书十一	
	宋拓本孙过庭《书谱》	顾从义			日本中村不折旧藏 ^[1]	
	宋拓《十七帖》(上野本)	顾从义			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	
	宋拓《淳化阁帖》	顾从义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书四	
	宋拓《定武兰亭》	顾从义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四《跋定武兰亭》	
	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翁方纲旧藏大名成氏本)	顾从义			钤“玉泓馆珍秘”(朱文)	上海图书馆
	宋拓《化度寺碑》(庆历间拓本)	顾从义			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一	
	(传)南宋马和之《小雅南有嘉鱼篇图》	顾从礼				波士顿美术馆

[1] 启功:《孙过庭〈书谱〉考》,中国书法家协会主编:《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书史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484页。

(续表)

藏品类别	藏品名称	所有者	顾氏题跋	顾氏铃印	现藏地(著录)	备注
绘画	唐韩滉《五牛图》	顾从德			故宫博物院;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十五名画题跋	
	(传)唐王维《江干雪意卷》	顾从德	有顾从德跋	钤“顾氏芸阁珍藏”(朱文)、“汝修”(白文)、“顾”、“从德”连珠印	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赵士雷《湘乡小景图》	顾从德	有顾从德跋		故宫博物院	
	南宋马麟《层叠冰绡图》	顾从德	有顾从德跋	右下钤“顾氏汝修”(白文)、“顾氏芸阁珍藏”(朱文)	故宫博物院	得自陆完家族,售至项元汴
	金李山《风雪松杉图》	顾从德		钤“汝修”(白文)、“顾氏芸阁珍藏”(朱文)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卷后有隆庆戊辰(1568)夏六月王世贞跋,又有是年六月十六日文伯仁观款,同观者尚有钱穀、顾圣之、尤求
	元赵孟頫《水村图》	顾从德		钤“汝修”(白文)、“顾氏芸阁珍藏”(朱文)	故宫博物院	后流入王世贞
	明文伯仁《方壶图》	顾从德		右下钤“顾氏汝修”(白文)、“顾从德印”(朱白相间),左下“顾氏芸阁珍藏”(朱文)	台北“故宫博物院”	
	唐吴道子《观音七十二化身卷》	顾从义			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	
	五代巨然《小景山水卷》	顾从义			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	
	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	顾从义		钤“顾从义印”(朱白)	东京国立博物馆	

(续表)

藏品类别	藏品名称	所有者	顾氏题跋	顾氏钤印	现藏地(著录)	备注
绘画	宋李公麟《蜀川图卷》	顾从义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宋李公麟《九歌图》	顾从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顾从义			大英博物馆	
	南宋马麟《玉蝶梅图》	顾从义			顾复《平生壮观》卷八	
	元赵孟頫《绢画小山水卷》	顾从义			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	
	元王蒙山水三幅	顾从义			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二	
	明杜琼《南村别墅图》	顾从义		钤“南华内史顾从义印”(朱文)	上海博物馆	
	明钱穀《樊川诗意图》	顾从义		有顾从义印,印文不详	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八;《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十九画二十九	
	明文伯仁《万壑松风图》 ^[1]	顾从义		有顾从义印,印文不详	汪珂玉《珊瑚网》卷四十二	
	明文伯仁《四万山水图》	顾从义			东京国立博物馆	四幅,分别为《万壑松风图》《万山飞雪图》《万竿烟雨图》《万顷晴波图》
	明文伯仁《园林十五景》(即《芳园十五景》)	顾从义			香港艺术馆虚白斋	
	明文伯仁《南溪草堂图》	顾九锡		前钤有“顾九锡印”(朱文)	故宫博物院	

[1] 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八《樊川诗意图》条云:“天启辛酉(1621)春,汤玉林共文氏《万壑松风》持来,俱有顾砚山印记。”同卷《文德承画万壑松风》条又云:“汪玉水购得文五峰《万壑松风图》。”由此可知该画为文伯仁所作。《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修订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445页。

(续表)

藏品类别	藏品名称	所有者	顾氏题跋	顾氏钤印	现藏地(著录)	备注
古籍	宋刻本《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六函六十六册	顾从礼		钤“武陵郡图书记”(朱文，无边)、“顾从礼印”(白文)	《天禄琳琅书目》卷三	是书经过文徵明、顾从礼、王世懋、莫是龙递藏
	宋刻本《汉书》，五函四十四册	顾从德		钤“顾从德印”(白文)	《天禄琳琅书目》卷二	赵孟頫旧藏，前有赵孟頫小像并陆师道题跋：“长洲陆师道题于顾汝修芸阁。”
	宋刻本《后汉书》，五函四十册	顾从德		钤“顾从德印”(白文)	《天禄琳琅书目》卷二	
	宋刻本《新唐书纠谬》，一函四册	顾从德		“武陵世家”(白文)、“顾汝修印”(白文)、“顾蒙”(朱文连珠印)	《天禄琳琅书目》卷二	“顾蒙”印亦见于顾氏旧藏《唐书直笔新例》，是书之上钤“顾蒙”印二方，暂不知为顾家何人，或为顾从德孙辈，俟考。
	宋刻本《唐书直笔新例》，一函二册	顾从德		钤“武陵世家”(白文)、“顾汝修印”(白文)、“顾蒙”(朱文)、“顾蒙”(白文)	《天禄琳琅书目》卷二	
	宋刻本《资治通鉴》，十八函，一百十七册	顾从德		钤“顾”“从德”(朱白文连珠印)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四	是书明代经长洲文氏、上海顾氏、携李项氏递藏
	元刻本《资治通鉴》，二十函一百六十册	顾从德		钤“武陵”(连珠印，白文)、“顾从德印”(白文)	《天禄琳琅书目》卷五	
	宋刻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一函十四册	顾从德		钤“方壶山人”(白文)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	
	宋刻本《六家文选》，四函三十二册	顾从德		钤“从”“德”(连珠印)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	

(续表)

藏品类别	藏品名称	所有者	顾氏题跋	顾氏钤印	现藏地(著录)	备注
古籍	宋刻本《古文苑》，一函六册	顾从德— 顾晋		钤“武陵”(白文，钤于卷首)、“武陵”(白文)、“顾从德印”(白文)、“顾晋之印”(朱文、钤于卷首)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	顾晋为顾从礼孙，见孙向群《顾从德家族辈分行第事迹考》
	明抄孤本《诗渊》	顾氏		钤“芸阁”“文华内史顾从礼印”	国家图书馆	陆深旧藏
	宋刻本《幼幼新书》四十卷(阙三卷) ^[1]	顾氏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四子部二	自顾从义手中售出
	宋绍兴十七年(1147)《古三坟书》三卷，一册	顾从德		钤“武陵世家”(白文)、“顾汝修印”(白文)	国家图书馆	
	南宋刻本《礼记释文》，四卷六册	顾从德		有顾从德印记，具体不详 ^[2]	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一《礼记释文》顾广圻跋	
	宋淳熙四年(1177)刻本《礼记》	顾从德		钤“顾汝修印”(白文)、“宜子孙印”(白文)	国家图书馆	
	宋嘉定间刻本《乖崖集》四册十二卷附集一卷	顾从德		钤“顾汝修印”	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集部	
	宋刻本《春秋传》三十卷	顾氏		卷首有“顾从德印”“顾从义印”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五 ^[3]	
	宋刻本《锦绣万花谷》，四函五十册	顾九防		钤“顾九防印”(朱文)、“顾九防印”(白、朱文)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	九防，从义子

[1]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四子部：“《幼幼新书》四十卷，明刊本……是书为明万历间吴郡陈履端编订。履端业医，尝于云间顾研山所购得宋刻本，阙三卷，复于欽程大纲家抄得。略加删节刻之。”从瞿镛所记可知，《幼幼新书》为宋绍兴间刻本，上海顾家所藏者阙三卷，售与陈履端，陈氏复自歙县藏书家抄补，删节后而刻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2] 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一《礼记释文》顾广圻跋：“南宋槧本《礼记郑氏注》六册，明嘉靖时上海顾从德汝修所藏，后百余年，入昆山徐健菴司寇传是楼，两家皆有图记。”从顾广圻跋可知是书中前有顾从德鉴藏印章，具体不详。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一，《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3]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五，《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通过分析上表顾氏之藏品,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即在书画收藏方面,顾氏兄弟基本保持自己藏品所有权的独立性,而在宋版古籍的收藏上,则很可能是顾氏兄弟间所共有。在顾氏所藏之宋版书中,一方面所钤印章往往使用“武陵顾氏”“顾氏世家”这类表明家族郡望的印文,如《新刊唐柳先生文集》钤“武陵郡图书记”印,《资治通鉴》钤“武”“陵”连珠印;另一方面,尚有多部古籍中,不仅出现“武陵世家”印文,而且还钤有具体的名章,如《新唐书纠谬》钤“武陵世家”“顾从德印”,《古三坟书》钤“武陵世家”“顾汝修印”,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图书馆藏陆深旧藏明抄孤本《诗渊》一书,内钤顾从德的“芸阁”印,以及顾从礼“文华内史顾从礼印”印,此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五著录《春秋传》一书中,分别钤“顾从德印”与“顾从义印”。合理的解释是,顾家的古籍收藏活动在顾定芳时期即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顾家所收藏的古籍极有可能在顾定芳去世之后,成为顾家兄弟的共同财产;而书画藏品则是顾氏昆仲各自按照其喜好、机缘、财力等分别购藏。目前在曾经顾氏昆仲收藏过的书画中,仅见原属顾从义旧藏《蜀素帖》上钤有顾九锡之印章,其他顾氏旧藏书画藏品中尚未见到同时钤有顾氏多人印章的例证,这或许也能证实我们以上的推测。

关于顾氏家族藏品所有权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即隆庆三年(1569)《集古印谱》中所载古玺印的所有权问题。就目前的文献来看,这批印章应该和顾家的宋版古籍一样,是属于顾氏兄弟所共有的,黄姬水《顾氏集古印章序》所说的“三世五君,极搜穷购,得古印章凡若干有奇”一语,应为顾氏藏印的真实写照。由此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既然顾家所藏印章是家族所共有,何以万历三年(1575)《印藪》一谱中仅列顾从德之名?合理地解释是该谱由顾从德总其事,顾氏其他兄弟则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事,但未作署名。这种推测尚有一个前人未曾注意过的重要旁证,即在《印藪》成谱过程中,除了我们熟知的顾从德、罗王常,以及刻工姚起直接参与并署名谱中之外,尚有苏州蔡伯玉亦参与其事。蔡伯玉(?—1588),字孟坚,苏州西洞庭(今苏州吴中区金庭镇西蔡里)人,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二十四《蔡孝廉琳泉墓志铭》:

孝廉亦尝从有司诸生试,不利弃去之,因博综群书,既名成。而云间张玄超氏聘之校阅古今艺文,甚相洽也。其宦钱塘而以御史檄编《唐诗分类》,亦孝廉佐之。他若顾汝修兄弟之《印藪》、何元朗之《语林》、冯汝言之《诗纪》,俱孝廉与有力焉,而逡巡辞避,不欲厕名其间,故无能知者。^[1]

据王世贞此文所载,蔡伯玉与顾氏《集古印谱》的作序者黄姬水为至交;又,王世贞、世懋兄弟曾延聘蔡氏至其家教授其子侄辈读书,另王世贞与顾从德、从义等又有密切交往,故而王世贞所记“他若顾汝修兄弟之《印藪》……俱孝廉与有力焉,而逡巡辞避,不欲厕名其间,故无能知者”一语极为可信。王世贞写下这篇墓志铭时,顾从德去世仅仅半年左右^[2],如果蔡伯玉没有参与《印

[1]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二十四《蔡孝廉琳泉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29页。

[2] 顾从德生于正德十三年(1519)十二月,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春,详细考证见杜志强《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藪〉版本的初步考察》,《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426页。

藪》的编辑工作，王世贞完全没有必要硬将蔡氏列入其中，毕竟这时顾家兄弟中的顾从义，还有罗王常皆在世。这则史料的发现提示我们，参与《印藪》的编纂人员并非全部“厕名其间”，实际参与而未在谱中署名者应当不止蔡氏一人；此外，从王世贞径直说“顾汝修兄弟之《印藪》”一语也可以得知，顾氏兄弟中的其他人，如与顾从德关系较为密切，且在《集古印谱》《印藪》的编辑过程中尚在世的顾从义必定也参与了二谱的编辑工作，只不过其未署名谱上，仅在黄姬水等人的序言中出现而已。

（二）顾氏书画、古籍藏品的散佚

顾氏书画藏品的散佚极不寻常，至迟在隆庆六年（1572）之前，顾氏藏品中的书画两类已出现大规模的散佚。隆庆六年（1572）的五月十五日，顾氏兄弟借由沈明臣之口讲道：

余家自御医府君而下，世嗜蓄古人名迹，故商周彝鼎之属，及法书名画、金玉印章之类，仅仅凡数十种矣。一罹倭变，迁徙流离，再遭时艰，狱辞连染，故三世所蓄一旦归于有力，而印章仅存，亦不敢保其不它。^[1]

从顾氏兄弟此语中，能够感受到其家族部分藏品应该是在短时间内突然散佚，散佚的原因是“一罹倭变，迁徙流离”与“再遭时艰，狱辞连染”。嘉靖时期倭变的侵扰在江南、东南一带时见，虽然倭寇侵扰时会突然而至，但嘉靖年间上海等地士人必有所准备，如顾从礼即曾助修上海城墙，所以即便倭寇来袭，也不至于突然措手不及。而“再遭时艰，狱辞连染”一语表明在隆庆六年（1572）之前，顾家曾遭遇某项重大变故，以致有牢狱之灾，这极有可能是顾家牵连到某项政治事件中，具体的变故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结合几件顾氏书画藏品的散佚经过，也确实能够印证隆庆、万历之交时，顾氏藏品的异常变动，如原属顾从德旧藏的《兰亭诗并后序》即在此时易主，现存该作后有王世贞两跋，第一跋云：

余从顾氏所骤见之，恍然若未识，久看愈妙。因损一岁奉获之，仍为歌志于后。吴郡王世贞谨书。

一个“骤”字，多少能够看出王世贞看到这件藏品时的不同寻常，王世贞所言“损一岁奉获之”，表明王氏在写下这段题跋的时候，《兰亭诗并后序》已经成为弇山园中之藏品。王世贞的第二则跋中有明确的记载时间——“万历改元（1573）初秋，书于九江道中，舟行如画”。由此可知该作从顾家流出的时间必在隆庆、万历之交前后，这与《集古印谱》成书时（1572）顾氏所说“三世所蓄一旦归于有力”的时间相吻合。不仅顾从德的藏品在此时散佚，顾从义之藏品在此时亦有流散的记载，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点字号第九）著录了顾从义旧藏黄庭坚楷书《头陀赞》，此作后有王穉登跋语：

[1] 沈明臣：《集古印谱序》，顾从德辑《集古印谱》，隆庆六年（1572）墨铃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线善833516-27）。

涪翁大真书《头陀赞》真迹，神品上上……此吾乡吴文定家旧藏，后归一时贵，最后乃入上海顾廷尉汝和斋中。廷尉之子出以售人，将营负郭。仆方修头陀行，正当购此，惜子母青蚨萧瑟，不能偿十五秦城，楚人之弓未知竟入谁手。此间世名迹，得之者幸毋惜七宝庄严耳。后学王穉登敬书。

虽然王穉登此跋中未有明确纪年，但依然能够考证出该跋大致的时间。王穉登生平崇信佛教，其“方修头陀行”在其生活中是标志性的事件，即其舍宅结“半偈庵”居之，此事皇甫汭、王世贞、世懋兄弟皆有诗作赠予王穉登，文嘉曾为其绘《王百穀半偈庵图》（今藏故宫博物院），并抄录皇甫汭、王世贞、世懋三人赠诗于其上，文嘉款云：“万历癸酉腊月，文嘉画并录。”“万历癸酉”亦即万历元年（1574），其时间与王世贞得到顾从德旧藏《兰亭诗并后序》的时间一致。又，王穉登之跋语亦颇耐人寻味，王跋所言“廷尉之子出以售人，将营负郭”。“将营负郭”是添置田产、谋求生计较为体面的说法，结合顾氏兄弟在《集古印谱》中所言隆庆末顾家“再遭时艰，狱辞连染”的说辞，以及“负郭”之典多与穷困之意相关联来看，恐怕顾从义之子出售《头陀赞》并非是添置田产，极有可能是为了维系顾家之生计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万历后期顾家昆仲的子辈，亦即顾九锡一辈，虽然人丁较前几代人丁更为兴旺，但其家族的文化声望却日渐衰落，这实际上在万历初年即已经初现端倪，或许也与顾家“再遭时艰，狱辞连染”不无关系。除了王世贞入藏了多件顾氏旧藏外，其弟王世懋也入手过顾氏藏品，如顾从德旧藏赵孟頫《水村图》即为王世懋所得，董其昌在此作中有跋，云：

娄江“二王”皆好藏古人书画真迹，敬美尤工临池，所收独精，此卷为子昂得意笔，在《鹤华图》之上，其萧散荒率，脱尽董、巨窠臼，直接右丞，故为难耳。二图皆在予几案，《鹤华》归同年吴光禄，此卷归程季白，皆鉴赏家，余无复失弓之叹。董其昌重观题，己未九月。（图19）

董其昌写下这段题跋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这时顾氏兄弟都已经去世，并且顾家的藏印也已经散尽。董跋中的“娄江‘二王’”即王世贞、世懋兄弟。《水村图》在万历朝数易其主，按照董其昌所记，从顾家流出之后，经由王世懋、董氏本人收藏，最终在万历四十七己未（1619）前后流入徽州程季白手中。徽州程季白在收得《水村图》之前，已经经由项元汴后人购得顾家旧藏古玉印三百余方，当然，这是后话，我们留待下文再展开。下表所列顾氏藏品流向，一窥其旧藏去向（除顾从义旧藏黄庭坚《头陀赞》外，其他均有确切收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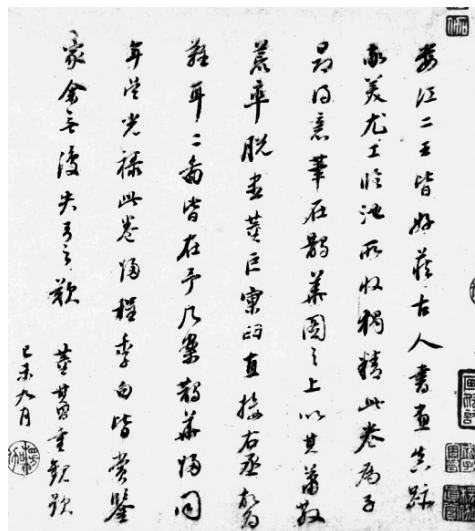


图19 顾从德旧藏赵孟頫《水村图》卷后董其昌万历四十七年（1619）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顾氏藏品流向表

藏品名称	原属	流向	交易价格	交易时间	出处
唐拓《定武兰亭》	顾从德	项元汴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
赵士雷《湘乡小景图》	顾从德	项元汴	五十金	嘉靖二十年（1541）	故宫博物院藏《湘乡小景图》项元汴题跋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顾从德	项元汴			《神仙起居法》前隔水顾从德、项元汴印
马麟《层叠冰绡图》	顾从德	项元汴			顾从德、项元汴鉴藏印
传柳公权《兰亭诗并后序》	顾从德	王世贞	莫是龙云王世贞花费“十万元”购买，王世贞自言“因损一岁奉获之”	万历元年（1573）	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五；《兰亭诗并后序》卷后王世贞题跋
赵孟頫《水村图》	顾从德	王世懋—董其昌—程季白			赵孟頫《水村图》后董其昌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传王维《江干雪意图》	顾从德	王世懋 ^[1]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卷四
宋版《资治通鉴》十八函一百十七册	顾从德	项元汴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四
黄庭坚《头陀赞》	顾从义	未知		万历元年（1573）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
张旭《兰馨帖》	顾从义	项元汴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
张旭《春草帖》	顾从义	项元汴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
张旭《烟条帖》	顾从义（或顾从德）	项元汴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
顾恺之《女史箴图》	顾从义	项元汴			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前隔水董其昌题跋（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 按，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二、卷四记此画藏王世懋处，《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第450页。然另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江干雪意图》卷末董其昌题跋“顷于海虞严文靖家又见《江干雪有卷》”一语，可知此图在王世懋手中时间较短，后为严讷所得。

(续表)

藏品名称	原属	流向	交易价格	交易时间	出处
李公麟《潇湘卧游图》	顾从义	陈所蕴— 吴廷			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前隔水董其昌题跋(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李公麟《蜀川图》陈所蕴题跋(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李公麟《九歌图》	顾从义	?—董其昌			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前隔水董其昌题跋(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李公麟《蜀川图》	顾从义	董其昌—吴廷—王思延			李公麟《蜀川图》董其昌、陈所蕴题跋(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米芾《蜀素帖》	顾从义、顾九锡	项元汴			《蜀素帖》顾九锡、项元汴钤印
宋版书《汉书》	顾氏	王世贞—徽州某—钱谦益	具体价格不详,王世贞言及其“余失一庄而得之”		《天禄琳琅书目》卷二
钱穀《樊川诗意图》 ^[1]	顾从义	汪珂玉			汪珂玉《珊瑚网》卷四十二名画题跋十八
文伯仁《万壑松风图》	顾从义	汪珂玉			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十八
文伯仁《万壑松风图》(四万山水图之一)	顾从义	陈所蕴			陈氏鉴藏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文伯仁《万山飞雪图》(四万山水图之一)	顾从义	陈所蕴			陈氏鉴藏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文伯仁《万竿烟雨图》(四万山水图之一)	顾从义	陈所蕴			陈氏鉴藏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文伯仁《万顷晴波图》(四万山水图之一)	顾从义	陈所蕴			陈氏鉴藏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 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十八称其收得顾从义此作时间为天启元年(1621)春,此时顾从义早已去世多年。《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修订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四、聚集与流散：顾氏家族所藏古玺印的聚散（1556—1644）

古玺印是上海顾氏另一大收藏重心，隆庆三年（1572）顾氏之《集古印谱》首册前存朱印牌记云：“古玉印百五十有奇，古铜印千六百有奇。家藏及借四方者，集印数年乃成仅廿本……”^[1]（图20）字样。前揭顾氏古玺印藏品与宋版书的所有权应该是顾氏“三世五君”共同所有，从“集印数年乃成”一语也可看出顾氏收印所持续之时间较长。关于顾氏藏印，目前能够明确知道其来源的仅丹阳孙楨旧藏。^[2]孙楨（1506—1566），字志周，一字仲墙，号石云，丹阳（今属江苏）人，嘉靖间重要的收藏家，其“名画法书，厚酬广购，以聚所好，久之牙签万轴称富矣”。^[3]嘉靖三十五年（1556）之前，孙楨将其所藏秦汉印章制作成原钤印谱《石云先生印谱释考》（下文简称《印谱释考》），至迟也在此年，因不堪倭寇袭扰丹阳，孙楨变卖家产避倭金坛，所藏古玺印为顾家所得。俞允文（1513—1579）在《仲蔚先生集》中多次提及孙氏，并谈及其曾至丹阳孙家看过这批印章，这则史料早已为印学研究者所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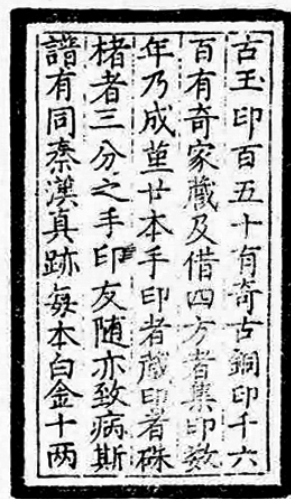


图20 顾从德、罗王常辑《集古印谱》，隆庆六年（1572）墨钤印本卷前牌记，上海图书馆藏

嘉靖间，余至丹阳，孙氏出所藏秦汉玉印三十余钮，皆私印，铜铸官私印七十余钮。其钮各异，有龟钮、驼钮、鼻钮，又有阳阴文子母印。孙氏名楨，颇为博古，秦汉魏晋及六朝印文类能辨之。近上海顾氏已购得孙氏印及次第购得三千余印。^[4]

此外，姜绍书在其《韵石斋笔谈》中也有类似记载，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秦汉印》云：

上海顾氏所藏汉铜玉印最多，有印谱行世，而实始于河庄之孙。嘉靖间，外大父石云孙君好古博雅，藏汉玉印三十余方，铜印七十余方，其钮各异，有龟钮、驼钮、鼻钮，又有阳阴文子母等印。石云于秦汉魏晋及六朝印文类能辨之。后为上海顾氏购得，复次第购印三千有奇，盖由孙氏始也。^[5]

[1] 顾从德辑：《集古印谱》，隆庆六年（1572）墨钤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本。

[2] 关于孙楨之生平，及其《石云先生印谱释考》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可参阅拙文：《明嘉靖间孙楨〈石云先生印谱释考〉研究——兼论明代嘉万年间集古类印谱编纂体例的演进》一文，《第四届全国高等书法教育论坛暨“从篆刻到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54—270页。

[3] 姜宝：《石云居士孙君墓志铭》，见孙楨：《石云先生遗稿》，《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十三册，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581页。

[4] 俞允文：《仲蔚先生集》卷二十二《汉印说》，《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3页。

[5]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秦汉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2页。

对比姜氏与俞氏的文字，基本可以肯定，姜绍书是转述自俞允文，但即便姜绍书所言为转述，我们也不能轻视姜氏的言论。姜绍书之祖父姜士麟为孙楨之婿，其父姜志鲁与其叔父姜志邹曾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整理刊印过孙楨之遗著《孙石云先生遗书》，及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其仲氏又搜匿剔隐，哀为七种”，即姜志邹又哀辑孙楨七种遗作。^[1]

至迟在嘉靖二十年（1541），上海顾氏与丹阳孙氏之间即已存在较为密切地交往。今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士雷《湘乡小景图》曾先后归顾从德之芸阁与项元汴之天籁阁，顾从德与项元汴在该画上各有跋语一条，顾从德之跋对于认识顾氏与丹阳孙楨家族之关系，十分重要，^[2]（图21）顾跋云：

嘉靖辛丑（1541）冬，以五十金得之于黄茂夫氏，丹阳孙曲水定价，顾从德记。

前文已经提及，黄茂夫即苏州黄穰，是一位职业古董商，而顾跋中所言定价者“丹阳孙曲水”则为孙楨之父孙方。孙方，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御史，所居有曲水山房。其弟孙育，字思和，号七峰，官至中书舍人，因其无子，孙楨出继孙育为子。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定窑鼎记》：

定窑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弘间藏于吾邑河庄孙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铭镌于炉座。曲水、七峰昆仲乃朱阳赏鉴家，与杨文襄、文太史、祝京兆、唐解元称莫逆，西涯亦其友也。^[3]

孙方、孙育昆仲以富收藏享誉江南，其收藏范围涉及字画、碑帖、古玺印、古玩等，从孙方为顾从德定价一事来看，孙、顾二家在书画鉴藏方面有着良好的互动，顾氏所藏宋拓《十七帖》也基本可以确定来自孙氏，故而嘉靖三十五年（1556）前后，顾氏购得孙楨藏印即为顺理成章之事。关于孙楨藏印的体量，俞允文与姜绍书所记均在百余方左右，孙楨之《印谱释考》中载印93方，与俞、姜二人所记也大致相符，所以顾氏所收孙楨旧藏的数量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太多，也应在百余方左右。《印谱释考》一书分上、中、下三卷，首列该印印文内容，次材质，次钮制，最后对该印进行考证，考证内容包括可印主、印文正讹、用印制度等。万历四十五年（1617）姜志邹重新刊印是书时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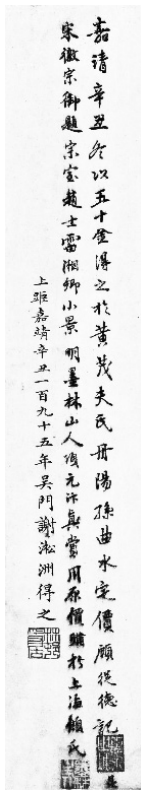


图21 顾从德旧藏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卷末嘉靖二十年（1541）顾从德、项元汴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1] 姜志邹所整理孙楨著述分别为《石云先生遗稿》一卷附录一卷、《石云先生印谱释考》三卷、《江浒迂谈》一卷、《淳化阁帖释文考异》十卷、《校订新安十七帖释文音译》一卷、《金石评考》一卷、《琅琊王羲之世系谱》二卷图一卷别派一卷。

[2] 古菲先生已经敏锐地注意到顾从德跋语中“孙曲水”与丹阳孙楨之关系，但其怀疑“孙曲水”为孙楨，稍误。见古菲《万历年间的集古印谱和文人篆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4页。

[3]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定窑鼎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此谱旧有浮粘印文，年久脱落，不可复得，考之顾氏《印藪》，大略具载，故不复摹入。万历丁巳岁菊月，外孙姜道生拜手谨识。

姜志邹已经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其将《印藪》与《印谱释考》二者相互校雠比对，认为《印谱释考》中的印章《印藪》中“大略具载”，故而姜氏仅仅将文字重新整理一过刊印，印蜕则“不复摹入”。《印谱释考》中的印蜕不仅“大略具载”于《印藪》中，在《印藪》中，孙楨的印文考释成果，直接被顾氏所采用，多方印章的考释文字几乎未做改动，仅有部分印章之下的文字有所删减，由此更可证顾氏在编纂《印藪》时参考过孙氏之谱。

接下来再谈一下顾氏藏印之散佚问题。前揭顾氏书画藏品大规模散佚的时间节点在隆庆、万历之交，而顾氏所藏古玺印则在此时间基础上，又保存了40年左右方逐渐散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

《印藪》中所列，及顾氏续收，玉章多至八百方，大半皆出两汉，后为吾里项墨林所得，余皆得寓目，茗华琬琰，不足比拟。至今思之，梦寐中尤为色飞。闻今亦渐散佚，渐为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1]

又，程远《古今印则》前载张纳陛序，在是序中张氏谈到程远曾至项元汴子侄处借观藏印：

谒其友人项君希宪、晦夫、玄度昆季辈，尽发所藏汉印，精择而谨摹之，并集近代诸名家于后刻，名曰《印则》。^[2]

古菲先生综合沈德符与张纳陛的记载，认为顾氏所藏的玉印，包括赫赫有名的“疾疾除永康休万寿宁”秦九字螭螭小玺，在万历三十年（1602）之前已经转售项家。^[3]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的确，程远《古今印则》所收录的第一方印蜕确为这方秦螭螭小玺。但这并不能证明该印连同顾氏其他玉印此时已经为项氏所有。程远《古今印则凡例》云：“云间顾氏《印藪》《印统》务在博收，其中既杂凡庸，复多重叠，殊混雅观，今录其可法可传，并《印藪》《印统》未收者，次序成帙，余则十删其四五。”^[4]从此凡例可知，《古今印则》中所收之印，仍有一半左右的数目是根据万历三年（1572）的木刻《印藪》，以及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秦汉印统》再次翻摹的。《古今印则》玉印部分下分秦汉小玺、王印、王后印、君印、侯印、私印，其中秦汉小玺6方、王印2方、王后印1方、君印4方、侯印1方、私印114方，校订者为项家项梦原，在该谱中，凡属于项家所藏之印，后皆注明“项氏宛委堂私藏”字样，而玉印部分，仅在四

[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二十六，第659—660页。

[2] 张纳陛：《印则序》，程远辑《古今印则》，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项氏宛委堂刻钤印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善12955）。

[3] 古菲：《万历年间的集古印谱和文人篆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5页。

[4] 程远：《古今印则凡例》，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项氏宛委堂刻钤印本。

方君印后署“项氏宛委堂私藏”字样(图22),这表明在《古今印则》玉印部分中,仅这四方君印的所有者为嘉兴项氏。其他未标注“项氏宛委堂私藏”字样的印章不应看作项氏所藏,其来源应是摹刻自《集古印谱》《印薮》《秦汉印统》等旧谱,并且“疾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一印自始至终并未归属过项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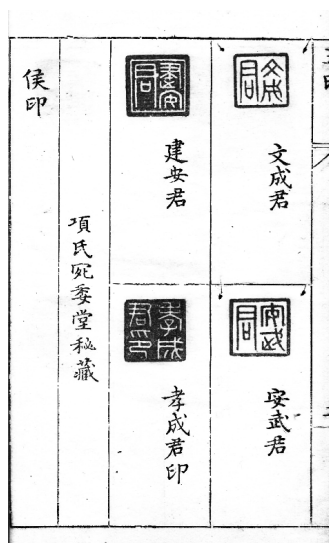


图22 程远《古今印则》玉印部分“君印类”后署“项氏宛委堂私藏”字样,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钤印本,香港松荫轩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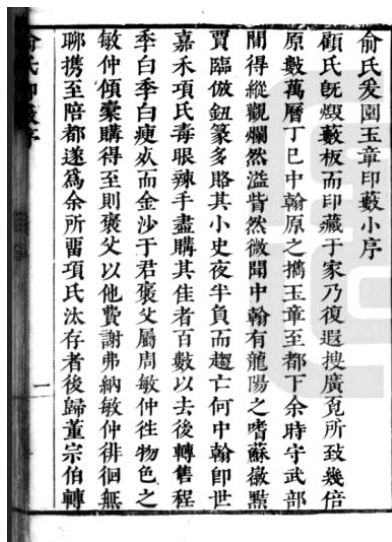


图23 俞彦《俞氏爱园玉章印薮小序》,俞彦辑《俞氏爱园印薮》,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钤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对于顾氏藏印散佚的认识之所以有不同的看法,至少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上海顾氏、嘉兴项氏,同时藏有一批秦汉印章,朱简《印经》云:“迨歙人王延年将上海顾汝修、嘉兴项子京两家收藏铜玉印合前诸谱,木刻《印薮》,务博为胜。”^[1]从朱简所记可知,在顾氏编辑印谱时,尤其是刊行木刻本《印薮》时,为了数量上博收,顾、项两家的藏印曾混在一起,编入了印谱之中。这就导致一种可能,本身就属于项元汴家族的藏品,在编辑完《印薮》之后,项氏完全有可能再将其取回,这部分藏印在归属权上自始至终都是项氏之物。所以程远摹刻《古今印则》时,项元汴子侄辈“项君希宪、晦夫、玄度昆季辈,尽发所藏汉印”,让程远观摩的即是本属于项氏家族的藏品,并非项氏购于顾氏之物。项氏家族的确购买过上海顾氏的藏印,但这是在《古今印则》编辑成书之后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事了。

二是上海顾氏的藏印并非一次性散去,而应分批次、按质量优劣等次第散去。就目前的史料来看,顾氏所藏铜印的散佚尚无法清楚地考证出来,玉印的散佚则相对较为明晰。俞彦《俞氏爱园玉章印薮小序》(图23)记述了顾家所藏玉印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至崇祯后期的散佚过程,云:

[1] 朱简:《印经》不分卷,四川省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顾氏既毁《菽》板而印藏于家，乃复遐搜广觅，所致几倍原数。万历丁巳（1617），中翰原之携玉章至都下，余时守武部，间得纵观，烂然溢眦。微闻中翰有龙阳之嗜，苏、徽黠贾临仿钮篆，多贿其小史，夜半负而趋，亡何中翰即世。嘉禾项氏毒眼辣手，尽购其佳者百数以去，后转售程季白。季白瘦死，而金沙于君褒父属周敏仲往物色之，敏仲倾囊购得，至则褒父以他费谢，弗纳。敏仲徘徊无聊，携至陪都，遂为余所留。项氏汰存者后归董宗伯，转售淮阴杜九如。杜复有中翰癖，苏、徽人舞其故智，散去亦复不少。余初犹妄意延津之合，今岁九如子生之携来，则溢至二百余，贗者十七，即存者亦皆下驷，向之倾仰，一时都尽矣。有户曹先生捐六白金求之，杜一夕逃去，咸可哂也。余以四十年所收购，并项氏原物，汇而行之，政得若干，自为一帙，不与铜章相杂。^[1]

俞彦序中的顾氏后人“中翰原之”暂不可考，虽然其极有可能是华亭顾懿德，^[2]但考虑到华亭顾氏与武陵顾氏并非同宗，保险起见，接下来我们仍按俞彦所称，将这位顾氏后人称为顾原之。通过俞彦记载可知，至迟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顾家藏印中玉印部分尚为完整，这部分藏品的质量也有所保证，即俞彦所说的“烂然溢眦”。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这批藏品逐渐散去，原因是顾原之有“龙阳之嗜”，被苏州、徽州商人配合其所狎昵者窃去，并且以伪作进行了替换。

最终促使这批玉印开始转手出售的契机是顾原之的去世。顾原之去世之后，这批玉印方为项元汴家族选择性地购去一部分，苏州、徽州商人所杂入的伪作，被剔除出去，这也就是俞彦所说的“项氏毒眼辣手，尽购其佳者百数以去”。其后，项家后人将这些印整体转售给徽州程季白，即俞彦所说“后转售程季白”。前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项氏藏印“闻今亦渐散佚，渐为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一事即指此事。^[3]项氏与程季白交易的时间是天启二年（1622），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所载《文与可晚霭横看卷》条云：“壬戌（1622）之秋，程季白飞霞舫成，招李君实及珂雪与余集舫中，看新得汉玉图书，约三百方。”^[4]汪珂玉与程季白为密友，曾自言“季白与余善，故获睹其珍秘”，^[5]故其所记程季白新得秦汉玉印一事十分可信。而被项氏剔除未购的印章，包括顾氏所藏的其他玉印大致也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稍后被顾氏转售至董其昌处，董氏再转售淮安富商杜九如，即俞彦所谓“项氏汰存者后归董宗伯，转售淮阴杜九如”。杜九如购入的数

[1] 俞彦：《俞氏爱园玉章印菽小序》，俞彦辑《俞氏爱园印菽》，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钤印本，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05273）。

[2] 顾懿德，字原之，为晚明画家顾正谊之侄，万历后期曾在北京光禄寺任职，其本人也以绘画名世。有关顾懿德及其绘画讨论可参阅（美）高居翰（James Cahill）著，王嘉骥译，《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1—162页。

[3] 古非先生据吴其贞《书画记》所记“伯（即吴元维）有别业在上海……顾氏所刻《印菽》并秦汉铜玉图章悉为所得。复增数百方集为共八卷，颜曰《印统》，王伯毅为之序，罗王常所刻也”一语，认为沈德符所记购买项氏藏印的“徽州富人”为吴元维。古非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吴元维并未收购顾氏、项氏藏印，后详。古非《万历年间的集古印谱和文人篆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6页。

[4] 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5] 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三《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量大致在200方左右。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定窑鼎记”：

万历末年，淮安杜九如贾而多贖，以钓奇为名，高出累千金，购求奇玩，董玄宰之汉玉章、刘海日之商金鼎咸归之。^[1]

又，《韵石斋笔谈》卷上“秦汉印”：

余曾见淮安杜九如家玉印二百余方，各甚精好，中无篆之章，而钮极佳，亦因其钮而存之耳。^[2]

范凤翼在《题潘建侯印章册子》一文中，也提及淮阴杜九如家藏汉玉印的情况：

顷日见吴门周氏、淮阴杜氏汉玉章，可四百余，皆以赫蹏得之，如对上世闻人。^[3]

实际上，杜九如所得的顾氏秦汉玉印，并非全部来自董其昌的转售。在此之前，杜氏曾直接从顾家收购过一部分秦汉玉印，这其中就包括那方著名的、曾在吴门一代流传数百年的“疾疾除永康休万寿宁”秦蟠螭小玺，俞彦《俞氏爰园印藪玉章》卷二首列是印，下注“顾售淮阴杜氏，今归爰园”即为证。杜九如从顾家购买这方九字小玺可能早于项氏“尽购其佳者百数以去”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以项家的鉴藏眼光，这方小玺必定首先进入项家了。

我们再将目光聚集到徽州程季白身上。程季白所收的项氏藏印在程家的时间很短，大部分印章前后仅逗留了四年左右，吴其贞为我们记录了这批玉印在程季白家中的遭遇，《书画记》卷一：

正言讳明诏，季白之子也。季白笃好古玩，辨博高明，识见过人，赏鉴家称焉，所得物皆选拔名尤。逮居中翰，因吴伯昌遭珰祸连及，丧身亡家于天启六年（1626）。子正言遂不能守父故物，多售于世，然奢豪与父同风……（正言）与予为莫逆交，观其铜器有姜望方鼎、方觚……项氏所集图章百方，皆各值千金者。^[4]

天启二年（1622）汪珂玉看到程季白新得项家所藏印时，尚且是300余方；而天启六年（1626）程季白死于狱中之后，300方玉印仅剩百余方。这距离程季白购得这批古印，仅仅过去了4年左右。关于程季白所藏玉印的流散去向，前揭俞彦所言“季白瘐死，而金沙于君褒父属周敏仲往物色之，敏仲倾囊购得，至则褒父以他费谢，弗纳。敏仲徘徊无聊，携至陪都，遂为余所留”一

[1]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定窑鼎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2]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秦汉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2页。

[3] 范凤翼：《范勋卿文集》卷五《题潘建侯印章册子》，《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4] 吴其贞：《书画记》卷一，《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1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

语已较为明确地指出。据俞彦所云，程季白死后，金坛于褒父委托古董掇客周敏仲前往程家代为收购，^[1]周敏仲购得后，于褒父却毁约，拒绝入藏这批辗转了多地的印章。于褒父，名玉嘉，字褒父，一字惠生，与董其昌、吴其贞等交好，“家最富，而不出仕，闭户著书”，^[2]是晚明金坛地区著名的书画收藏家，曾藏有惠崇《江南春》（即《溪山春晓图》）^[3]、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于褒父家业殷实，断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放弃这批印章，唯一可能的解释即是这批印章在辗转交易的过程中，精品不断被人替换，伪作不断加入。以于褒父鉴赏家的身份，不能看不出这批印章的真伪优劣，所以他“弗纳”。之后周敏仲将这批印章携至南京，最终被俞彦所购去，其时间在崇祯六年（1633）。《俞氏印藪序》云：“后闻顾氏所蓄俱已散在三吴七郡，无复妄想，不自意崇祯癸酉（1633），忽得玉章百余。”^[4]由俞彦序言可知，是年他所得程季白玉章数量在百余方左右，这和吴其贞在程季白子程正言处所见“项氏所集图章百方”，在数量上一致。

实际上，顾家藏印的真伪在万历后期即已经不能得到保证，尤其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后，顾家后辈基本不能守祖辈“三世五君”之藏。顾家藏印在几次的散佚过程中，每每被杂入伪作贗品，至崇祯朝时，这些号称顾氏旧藏的印章，已经面目全非，与嘉万时期的顾氏藏品可以说几乎不能看作同一批藏印了。这可以从最终的“冤大头”俞彦藏品中看出，崇祯十四年（1641）俞彦据其自藏——号称来源于顾氏旧藏的玉印辑成《俞氏爱园印藪》一谱（图24），是谱自卷二以下收秦汉玉印，其中卷二收小玺9方，罗福颐《印谱考》称“伪者六”。卷三收官印9方，通用10方，一字印、有名无姓印11方，周秦印23方，罗福颐认为本卷官印9方仅1方为真，其余皆伪；通用10方与一字印有名无姓印11方皆伪；周秦印23方“真者不过十”。卷四收私印，按平上去入四声分类，其中“平声姓”下收印37方，“上去入声”下收印18方，共55方，罗福颐认为这部分真者不过半。^[5]

关于顾氏藏印流散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徽州吴元维是否收藏过顾家藏印。吴元维，字伯张，号濂水，与吴其贞同属休宁商山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罗王常刊印《秦汉印统》一谱，吴元维为是谱之校订者。吴其贞在《书画记》谈道：

（王维《雪山归樵图》、李唐《古木寒鸦图》等）于戊寅（1608）秋九月朔日观之于仲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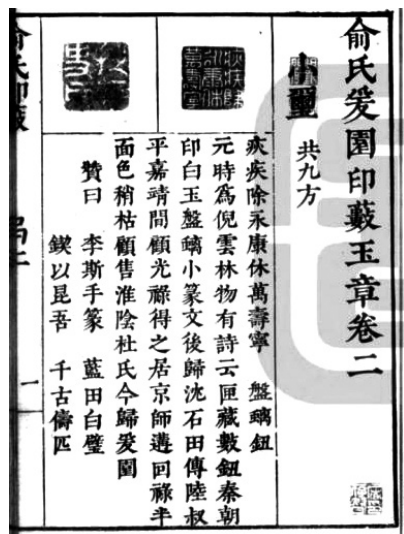


图24 俞彦辑《俞氏爱园印藪》卷二卷端页，明崇祯十四年（1641），国家图书馆藏本

[1] 周敏仲其人多次出入嘉兴大收藏家李日华的味水轩，生平依靠辗转各地收购、贩卖古董书画为生，详见《味水轩日记》。

[2] 卢世淮：《尊水园集略》卷十二《与程正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0页。

[3] 顾复：《平生壮观》卷六，《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6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577页。

[4] 俞彦：《俞氏印藪序》，俞彦辑《俞氏爱园印藪》，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钤印本。

[5] 罗福颐：《印谱考》卷一，1973年墨缘堂印本。

兄，盖濂水伯之子也。伯有别业在上海，嗜古玩，此则其收藏物。顾氏所刻《印藪》并秦汉铜玉图章悉为所得，复增数百方集为共八卷，颜曰《印统》，王伯穀为之序，罗王常所刻也。^[1]

按照吴其贞的记载，《秦汉印统》中所收印章乃吴元维购自顾氏旧藏，即“顾氏所刻《印藪》并秦汉铜玉图章悉为所得”。然而吴其贞所记并非史实。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印的《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载吴元维传，云：

易八七叔讳元维，字伯张，号濂水……服阙后以例入南雍，历满归理生业，而不屑铢铢两两，为臣虏守。好结交缙绅先生、词人、技艺士，警欬足以倾听，规模足以耸观，慷慨足以应人之缓急，即上洋士大夫咸愿与内（纳）交，良辰佳节，每置酒相招，致其欢洽。古玩所嗜惟字画，每购得之，余不多藏。山人王常集古图章若干，欲刻以传海内，而费重难堪，叔即捐貲，刻成命曰《印统》，今宇内图章取法焉。^[2]

从《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此传来看，吴元维在《秦汉印统》的刊刻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仅为“捐貲”而已。^[3]又，李维桢《秦汉印统序》：“而是时，云间顾氏取为《印藪》盛行于世，延年以未广，益购求增益之，而其友吴伯张相与参校品第，凡历廿年，功绪甫竟，付之奇（割）劂，而延年卒矣，伯张不欲没其所长，标而行之，名曰《秦汉印统》。”^[4]臧懋循《印统序》：“太原王常氏遍购诸博古家，积若干稔，增广若干册，以授新安吴元维氏合刻之，命曰《印统》。”^[5]李维桢、臧懋循二人皆未谈及《秦汉印统》所收印章为吴元维所藏。

五、结语

嘉万时期上海顾氏昆仲借由书画鉴藏、古籍刊刻、印谱制作等艺术活动，不断在江南地区累积其作为世家大族的声望。明人论及顾氏之古籍鉴藏，欧大任《芸阁记》中有“上海名族”之评，古籍刊刻方面，则有何良俊《草堂诗余序》中“顾子上海名家”一说，而在古玺印鉴藏方面，更有沈明臣《集古印谱序》中“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之语广为人知。顾氏在其最为珍视的一批宋版书中钤“武陵顾氏”“顾氏世家”“武陵”等郡望印章更能说明其家族成员对名列“世家”的追求与喜色。如果将视野放大至整个江南地区，即会发现，嘉靖时期是苏州及其周边的上海、嘉兴、无锡等地鉴藏活动的顶峰时期，所谓的“世家大族”在这一时期的艺术鉴藏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长洲文氏、上海顾氏、无锡华氏、太仓王氏、宁波范氏、嘉兴项氏等；进入万历朝以

[1] 吴其贞：《书画记》卷一，《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1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

[2] 吴应迁等纂修：《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3] 王洪军先生也已指出吴元维在《秦汉印统》中的作用仅为“捐资助刻”，见王洪军《罗王常〈秦汉印统〉本末考》，《文献》，2015年第3期，第23页。

[4] 李维桢：《秦汉印统序》，罗王常辑《秦汉印统》，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吴氏树滋堂刻本，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9788）。

[5] 臧懋循：《印统序》，罗王常辑《秦汉印统》，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吴氏树滋堂刻本。

后，尤其是万历后期以后，上述家族的鉴藏事业随着文徵明、文彭、项元汴、王世贞等吴门鉴藏“具眼”的去世，江南地区的鉴藏中心逐渐转至徽州一地，鉴藏话语权也随之落入徽人手中。万历十六年（1566）的夏天，王世贞邀同詹景凤在南京瓦官寺宴饮，席间詹景凤对王世贞说道：“曩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耶？”王世贞的反应是“默然”。^[1]言外之意，即对詹景凤所说持一种默认的态度。从詹、王所谈即可清晰地看出，万历中期以降吴门一带鉴藏话语权的逐渐衰落，徽州士人的逐渐崛起。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鉴藏重心的转移，并不仅仅体现在书画鉴藏方面，古玺印鉴藏也有这种趋势。当顾氏藏印逐渐散佚时，（万历）《歙志》中所记徽人吴良琦、方大治等，所藏古玺印数量却都达到一千余方。^[2]在古玺印鉴藏活动中所衍生出来的印学知识、篆刻创作观念也必然会随着艺术鉴藏重心的转移而转移。这也即是徽州印人在万历时期崛起印坛的一个关键因素。单纯地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徽州印人的崛起归结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多少是有点偏颇的。在面对詹景凤略有咄咄逼人的言论时，已经成为吴门新一代鉴藏领袖的王世贞采取了一种不予否认，更不予置评的态度。这种感受，万历中期吴门的周应愿恐怕也感同身受，面对声誉方炽的徽州印人何震，周应愿一方面称其“俱擅美誉”“颇逾前人”，另一方面却将其归入“江湖行家”，对其态度也是“吾所不知，更难备述”^[3]——周应愿的这种表述和王世贞的“默然”竟如此一致，这或许多少传递出从万历中期开始，吴门士人对其艺术话语权逐渐旁落的焦虑。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在读博士、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讲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三，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修订本）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2] （万历）《歙志》传第五《文苑》，转引自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3] 周应愿：《印说》“得力第十”：“江湖行家，如歙人何、越人沈、吾吴施、淞江胡，俱擅美誉，纷纷继起，颇逾前人，吾所不知，更难备述。”周应愿《印说》，明万历年刻本，常熟市图书馆藏。